
三峽工程 36 計：作者序 作者：王維洛博士

作者序

上天給三峽工程的判決：凌遲

一九五三年，毛澤東提出在三峽建壩，卡住長江洪水，從那時起，長江三峽工程就成中共幾代領導人的夢想。一九八二年，**始為三峽工程低壩方案開了綠燈。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中共新上任的總書記江澤民第一次出訪地就是三峽工程壩址，表明對工程的支援。一九九二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國務院興建三峽工程提案。一九九四年，三峽工程正式開工。一九九七年，三峽工程實現大江截流。這是三峽工程歷史最「輝煌」的時刻。江澤民、李鵬和中央、省、市領導人，都出席了慶祝典禮。三峽工程被譽為「利在千秋、功在當代」，「實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人類歷史上最偉大工程。

「三峽工程可以將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防洪標準從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可以保證荊江地區在遭遇千年一遇洪水時的安全」，「三峽工程的電將照亮半個中國！」，「三峽工程可以使萬噸船隊從上海直達重慶」，「三峽工程可以使川江航運單向運輸能力提高到每年五千萬噸」，「三峽工程可以讓北京喝到長江的水」，「三峽工程可以使百萬移民致富」，「三峽工程可以促進三峽旅遊事業的發展」，「三峽工程可以帶動長江流域這條經濟巨龍的騰飛」，「排渾蓄清可以解決三峽水庫泥沙淤積問題」。然而，三峽工程，其實只是騙子獻給皇帝自主創新發明的新衣。

二〇〇三年三峽工程蓄水之後，三峽工程的問題慢慢呈現在中國人眼前。移民安置問題、水質污染問題、水庫誘發地震問題，水位上漲引起的滑坡、崩坍問題，水庫淹沒區擴大問題、限制長江航運問題、珍稀動植物種類死亡等等。

雖然老百姓無法得到關於三峽工程嚴重問題的系統資料，但是從中國的政治人物對三峽工程的熱情驟減中，便可以看到，其對三峽工程保持的距離越來越遠：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日，三峽大壩封頂，中共中央領導全體缺席；二〇〇六年八月，《江澤明文選》出版，但是關於三峽工程的多次重要講話，卻未收入其中；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三峽工程開始向三峽工程的目標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衝擊，十一月四日結束抬高蓄水過程。這本是水庫大壩工程最重要之日，但在中國連個慶祝典禮也沒有。更甚者，中共國務院還在蓄水中途，發佈兩道金牌，停止蓄水。

有人認為三峽工程是「**、科學」決策的結果，特別有四百一十二位專家參加工程可行性論證，因此絕不會出錯。如果三峽工程出錯，那就證明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不是瘋子就是傻子。但是從中央決策層到謀士團體，再到地方官員，都不是瘋子，更不是傻子，而是絕頂聰明之人。他們在三峽工程的決策和建設過程中，輕鬆自如地使用三十六計。

中華幾千年文化，留下一些使用兵法的實例，縱然是孫臏、諸葛亮這樣的軍事家，也只是使用過其中幾個計謀而已。但三峽工程的決策者，卻能在不到三十年的歷史中，三十六計，計計使用。只是他們把三十六計用錯了地方。三十六計的核心是「詐」，兵不厭詐。但在科學技術的道

路上，來不得半點虛假，沒有計謀可用，只有實事求是，這是科學技術的基本原則。三峽工程決策發生錯誤，是工程決策**化和科學化的問題，而工程決策**化和科學化，又絕對是以社會**化和科學自由化為前提。世人關心這樣一個問題：三峽工程是否成為第二個黃河三門峽工程？筆者以為，上天給黃河三門峽工程的判決是：立斬；而對三峽工程的判決是：凌遲。三峽水庫從淤積到沖淤平衡的過程，是三峽庫區居民受難的過程，將面臨水位不斷上升，淹沒不斷擴大，滑坡、崩坍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的困境，他們將長期生活在恐懼之中。無論是立斬還是凌遲，最終的結果將是相同。

黃萬里先生有個遺願，要模仿杭州的岳墳，在白帝城上立幾個跪著的鐵像（根據李銳先生回憶黃萬里說三個鐵像，黃萬里先生和筆者通話時說四個鐵像），讓那些對於三峽工程錯誤決策負主要責任的人，向長江請罪，向中國人民請罪，向子孫後代請罪。

我堅信，黃萬里先生之遺願將得以實現。至於幾個鐵像是誰，還是不要具體指出為好。據說姓秦的人不到岳墳去，是因為怕別人以為他是秦檜的後代。筆者建議，一定要在這鐵像前，再立一個碑，一個向子孫後代表示歉意的碑，碑文的內容應是：請原諒，我們沒有能夠阻止他們。

黃萬里教授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日子中，多次託付子女和朋友：「我是看不到三峽建成後的後果了。你們還能看見，幫我記著看看，但願我的話不要言中，否則損失太大了。」替先生守靈，就是要幫他看著三峽工程，用自己的筆記錄三峽工程的發展。這本書也算是給先生的一個階段報告。

筆者最早和長江三峽結緣，還是在南京大學當學生時候，大學畢業論文題目就是關於三峽地區國土規劃。按照中國規劃體系，三峽地區國土規劃是三峽工程規劃的上一級規劃。四年時間，跑了三峽不少地方，認識不少三峽人，看了許多資料，包括三峽工程二百米等方案、三峽壩址處及三峽庫區的地質資料。一九九五年，離開中國到德國留學。因為沒有中學畢業文憑，在德國重新再上一次大學。大學畢業後，在多德蒙特大學教授「規劃與決策」、「規劃理論與方法」等課程。工程可行性研究和工程環境影響報告，就像每天的麵包一樣。一九九三年筆者完成博士論文。對比中德教育，筆者以為，在中國學會了「這樣學習」的本領，而在德國則學會了「如何學習」的本領。

當年看到關於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的部分內容，發現錯誤很多，工程目標定義不明確，論證分組報告之間也互相矛盾。如果這是德國學生的一篇畢業論文，對不起，只能給他一個不及格。當時筆者投稿給中國的媒體，大多數是沒有回信。有回信的則說，三峽工程是塵埃已落，再談三峽工程決策的錯誤，也沒有什麼意思。只有一封回信是正面的，表示願意發表文章，但是幾天之後又來信說，文章未能通過政治審查，不能發表。筆者只好把文章寄給臺灣和香港的媒體。

一九九三年，筆者在臺灣發表了《福兮禍兮——長江三峽工程的再評價》一書。當時發現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用了不少三十六計中的計謀，致使一般人不容易發現個中錯誤。於是萌生了三峽工程和三十六計這個題目的念頭。有朋友認為三十六計，計計都涉及，這很難寫。事實也是如此。三十六計，其含義十分深遠。從字面上理解是一回事，從內涵上或者其

延伸來理解，可能是另一回事；從過程來分析是一個意思，從結果來分析，又可能是另一個意思；從旁觀者來看是一幅圖，從參與者來看，可能是另一幅圖。本文只是收集了一些實例，還不很全面，尚有許多遺漏，需要補充和修正。

經過近十五年的時間，終於有了一個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得到許多朋友的支援，包括許多從未見面的朋友，他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和意見，包括對筆者觀點的批評。筆者只是想把自己知道的資訊和所理解的東西，告訴讀者，幫助讀者形成自己的觀點，掌握「如何學習」的本領。筆者希望通過「書」的平臺，和讀者進行公開的資訊交流和意見交換，希有一日，能在中國自由、公開地討論三峽工程問題，以及其他涉及國計民生的問題，而參加者並不僅只限於所謂的專家。

博大出版社的編輯在此書的編審過程中，認真嚴謹的作風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也為此書增色不少，在此深表感謝。

最後，筆者要感謝家人長年的理解、鼓勵和支持。

謹以此書獻給那些為三峽工程勇於發表自己看法、發出自己聲音的人們。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於德國

博大出版社授權（待續）@

aaa181715 2011-6-15 10:03

前言

詞源解釋，古語中有三十六計語，三十六計本為虛數，乃極多之意，後好事者附會，取四字（或三字）成語等立名目，湊足三十六實數。它們

是：瞞天過海；圍魏救趙；借刀殺人；以逸待勞；趁火打劫；聲東擊西；無中生有；暗度陳倉；隔岸觀火；笑裏藏刀；李代桃僵；順手牽羊；打草驚蛇；借屍還魂；調虎離山；欲擒先縱；拋磚引玉；擒賊擒王；釜底抽薪；渾水摸魚；金蟬脫殼；關門捉賊；遠交近攻；假道伐虢；偷梁換柱；指桑罵槐；假癡不癲；上屋抽梯；樹上開花；反客為主；美人計；空城計；反間計；苦肉計；連環計；走為上計。

第一個對三十六計進行系統科學研究的，不是中國人，而是瑞士人（註：現任德國法萊堡大學的沈格教授。）藉由其書，使三十六計走出了中國，進入世界。中共決策者機關用盡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與國務院，決定對長江三峽工程進行工程可行性論證。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中共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提案。儘管興建長江三峽大壩導致許多來自國內外的反對，但為讓工程上馬，中共決策者們可說是機關用盡。四川是**老家，當年老鄧最擔心的是三峽工程造成四川移民數量過多，因此長江水利委員會特地「瞞天過海」，為**制定一個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五十米的低壩方案，防洪功能不減，但移民人數只有三十三萬人（連同縣城一起搬遷的移民一共五十萬人）。之後，**便為三峽工程開了綠燈，贊成一百五十米方案。

二〇〇六年十月，三峽水庫蓄水至海拔一百五十六米，為此搬遷一百二十三萬移民。這時的水位只比一百五十米方案高出六米，但與五十萬移

民相較，整整多出了七十八萬人。二〇〇七年，重慶市提出城市發展戰略，再次搬遷三峽庫區居民二百三十萬至四百萬人，其中很多是已經「安置完畢了」的三峽工程移民。

無中生有

建設三峽大壩，大壩上游的重慶市和四川省受到的損害最為嚴重，最直接的損失就是水庫淹沒土地與城鎮。三峽工程的蓄水位越高，淹沒損失就越大。但出人意料的是，重慶市委書記肖秧，一九八四年竟向中共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將蓄水位從海拔一百五十米抬高到一百八十米，活脫是一齣現代苦肉計。

為此，中共中央三峽工程籌備組組長李鵬，帶領一批「專家」到重慶考察。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曾寫下「高峽出平湖」的詩句；而李鵬，這位留學蘇聯歸來的「水電專家」，在考察後向中共中央撰寫的報告中認定：三峽壩址處蓄水位海拔一百八十米，距離三峽壩址六百多公里之外的重慶朝天門碼頭處的水位，也是海拔一百八十米。因此，長度超過六百多公里的三峽水庫，是一個沒有水力坡度的平湖。從中央到地方，從專家到普通百姓，都相信這個「無中生有」的高峽平湖。如果說，黃河三門峽工程的失敗是由於迷信「聖人出，黃河清」，以致忽視泥沙淤積的問題；那麼長江三峽工程的失敗，便是由於執意實現毛澤東「高峽出平湖」的夢想，而忽視了水從高處向低處流這個最簡單的道理。

三峽工程 福兮禍兮？

中國古代兵法策略三十六計，在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和決策過程中，竟得到充份利用。反觀過去發生於中華幾千年歷史長河中，關於三十六計運用的實例，不少只是湊數而已；而三峽工程，能在短暫幾十年間，將三十六計悉數用上，實非易事。筆者好事，將其事記錄在此。

一九九三年筆者發表《福兮禍兮——長江三峽工程的再評價》一書，指出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以及工程決策程式的錯誤。其實早在一九八四年，中共國務院便已原則批准三峽工程建設，因此一九八六年才開始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根本是欲擒先縱。

同時，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不是論證三峽工程是否可行，是否應該上馬；而是論證三峽水庫的蓄水位高度，是一次建成、還是分幾次建設。更有甚者，許多具體工程技術資料，也是在可行性論證之前就已經確定了的，比如：三峽水庫的防洪庫容、三峽船閘的年通過力等等。其實，參加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科學家與工程師的任務，就只是為政治家的決策作注釋而已。

而一九八九年結束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關於三峽工程對於生態環境影響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弊大於利。但為了避免和決策層的正向衝突，科學家在可行性論證之後添了一句：許多不利影響可以通過人工措施加以限制。

一九九一年，中共國務院審查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時，以三峽工程生態

環境影響報告大綱未經批准為由，否定了對生態環境影響弊大於利的結論，重新組織第二個關於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的報告。數月後，以方子雲為首的生態環境二組，在原有資料的基礎上，得出了讓上級滿意的結論：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利大於弊。從弊大於利，到利大於弊，這不是「偷梁換柱」，又是什麼？三十六計全本上演綜觀中國三峽工程幾十年歷史，絕不僅僅只是幾齣摺子戲，而是三十六計，全本上演。至一九九五年，筆者已經收錄近二十條計謀在三峽工程決策過程中的運用，比如聲東擊西、調虎離山、擒賊擒王、趁火打劫等等。但還有十多條計謀沒有記錄，比如假道伐虢、關門捉賊、打草驚蛇等等，當時也曾產生一個主意，用其他相似的計謀來替代，如田忌賽馬、按圖索驥、大題小做、避實就虛，湊足三十六實數，但總覺不是十分理想，所以也就拖了下來。然經過十多年的努力，至今終於有了結果。

本書的目的在於拋磚引玉，相信有更多的人，會從更廣泛的角度來分析三峽工程決策的過程，或者從三十六計的深層含義出發，找出更適切的案例、作出更加深入的分析。筆者將按照三峽工程的論證、決策、建設、運用的發展歷史，將三十六計的應用穿插在這一過程之中，而不是按照一般研究三十六計的書那樣，按照計謀的分類和次序來寫。

aaa181715 2011-6-15 10:08

1

瞞天過海：低壩方案，請君上船

「瞞天過海」，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一計。

原文：「備周則意怠；常見則不疑。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太陽，太陰。」

拍板決策

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九六九年十月），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和水利部，向毛澤東提出修建長江三峽工程的建議。毛澤東本來是竭力支持以建設大壩和水庫來治理中國河流的想法，但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的失敗，使毛澤東火冒三丈，以致對大壩工程的熱情驟然大減，便以戰備為由，拒絕修建三峽工程的建議。

但是到了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卻欣然接受武漢軍區、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和水利部為他準備的生日禮物——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並做出莫名其妙的批示：「贊成興建此壩。現在設想是一回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一些現在想不到的困難問題，那又是一回事。那時，要準備修改設計。」從此，中國基本建設開始執行毛澤東在建設中隨時修改設計的方針，並給中國留下了無窮的禍害。直至目前為止，中國的黨史專家們，對毛澤東這個指示的本意，還不能做出解釋。

毛澤東去世之後，華國峰按照毛澤東生前的安排**，華有一個宏大的經濟發展計畫，建設十個大慶、以及十個鞍鋼……，同時也包括了三峽工程，而當時提到的三峽工程，還是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批准的正常蓄水位二百米的方案（比較方案一百九十五米和一百九十米）。但如今，中

共面對三峽工程歷史，從來不提華國峰，因為華國峰下臺原因之一，就恰恰是這個宏大的經濟發展計畫。

華國峰在權力鬥爭中失勢，**又回到了權力的中心，成為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政策的總設計師。誰也不否認，這位總設計師是掌握實權的「天子」。一九八〇年六月底，**在女兒的陪同下，經西安、成都，回四川老家省親，而實際上，**此次出訪的一個重要任務，便是親自到長江三峽地區看一看，為三峽工程決策拍板做個「調查研究」。

七月十一日，**從重慶朝天門碼頭登上「東方紅三十二號」輪船，沿水路出川，陪同的人員有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四川省省長魯大東、長江水利委員會（當時稱長江流域辦公室）副主任魏庭琚、宜昌地委書記馬傑、葛洲壩工程局局長廉榮祿等（註 1）。

在輪船上，**主要聽取魏庭琚關於三峽工程的彙報。魏庭琚在彙報中極力誇大建設三峽工程的效益：在防洪上，能保護中下游地區免遭滅頂之災；在發電方面，將是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發電站，年發電量一千一百億度，相當中國年發電量的一半；在航運方面，能使萬噸輪船從上海直達重慶；有利於南水北調，解決北京和華北地區的缺水問題，並且促進三峽地區經濟發展，等等。

其實三峽工程的防洪、發電、航運、南水北調和區域發展幾個目標，定義不準確，諸多目標之間根本是相互矛盾，不可能同時實現（註 2）。

**的老家是四川，三峽工程造成四川省移民過多，是他最擔心的問題之一。為此，中共水利部和長江水利委員會調整了他們的策略，不再堅持兩百米方案，而是採取分幾步走的方法，首先爭取中央最主要領導人做出對三峽工程上馬的決策，然後再一步一步地提高正常蓄水位和大壩壩頂高程。他們提出了一個低壩方案，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五十米，移民人數不超過五十萬（需要實際移民三十三萬，有些縣城因為大部分被淹沒，要求全部搬遷，移民總數可能達到四十至五十萬（註 3））且主要淹沒區域在湖北省，而不是四川省。為保險起見，甚至還做了預備方案，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二十八米，壩頂高程海拔一百四十五米，基本上不淹四川省。

於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聽取國家計委彙報時對三峽工程進行表態：「我贊成搞低壩方案。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至此，**為三峽工程開了綠燈。

註 1：參見張愛茹、劉金田《**視察紀實 1957-1994》，江蘇教育出版社，南京，二〇〇二年，第三五一至四〇四頁。

註 2：參見王維洛《福兮禍兮——長江三峽工程的再評價》。

註 3：參見李銳《關於三峽工程的六個問題》。

aaa181715 2011-6-15 10:12

瞞天過海 請君上船

其實，這一百五十米的低壩方案，根本是個騙人的方案。

雖然水庫的正常蓄水位為海拔一百五十米，但是大壩壩頂高程為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最高蓄水位可達到海拔一百七十三米（還有二米是用於風浪保險）。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是按照蓄水至海拔一百七十三米的能力計算，而在計算移民人數時，則是按照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五十米計算。那麼，當水庫發揮防洪效益，蓄水至海拔一百七十三米時，許多沒有被計算為三峽工程移民、沒有搬遷的居民該怎麼辦？長江水利委員會認為，這些居民可以跑到更高的山坡上去，即所謂的「跑洪」，等洪水過後，再回到被洪水淹沒過的家中。

此外，正常蓄水海拔一百五十米，移民五十萬人，也是騙人之說。二〇〇六年十月，三峽水庫蓄水至海拔一百五十六米，只比海拔一百五十米高出六米，但三峽工程為這個蓄水高度，足足搬遷了一百二十三萬人。

中共水利部和長江水利委員會誇大三峽工程的效益，以所謂一百五十米低壩方案，瞞天過海，促使決策者下最後決心，為三峽工程建設開綠燈。根據《永樂大典薛仁貴征遼事略》記載，西元六四三年，唐太宗李世民親自率兵三十萬征伐遼東，出征之前，房玄齡等大臣極力勸阻。部隊進發至海邊，李世民眺望一望無邊的大海，波濤洶湧，心想渡海十分困難，後悔出征之前未聽從房玄齡等的忠告。隨行眾將領擔心李世民改變主意，班師回朝，便聚集想辦法。大將薛仁貴想出一計：把唐太宗引進入海邊一座彩色營帳，請李世民入座飲酒，同時讓文武百官前來敬酒。唐太宗沉浸在美酒和讚美的歡樂之中，忘記渡海困難的憂愁。突然唐太宗

聽聞帳外有波濤洶湧之聲，手中的酒杯也傾斜了，便急忙揭開帳幕向外張望，這才發現，自己正與部隊一起乘船渡海，而且馬上就要抵達遼東。原來薛仁貴擔心太宗因大海阻隔而放棄東征，便將唐太宗騙上由船隻改裝的營帳，讓其飲酒作樂，在不知不覺的狀態下，與部隊一起渡海。故此計稱為「瞞天過海」。

中共水利部和長江水利委員會運用瞞天過海之計，不在薛仁貴之下。一九九二年，中共全國**批准的三峽工程方案，正常蓄水位為海拔一百七十五米，壩頂標高海拔一百八十五米，早已經不是**所支持的低壩方案。現今中國媒體將**於一九八二年所講的話：「我贊成搞低壩方案。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改成了「（三峽工程）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刪去了「我贊成搞低壩方案」這一句話，為的就是掩蓋**在一百五十米低壩方案上上當受騙，輕率做出錯誤決策的事實。中共黨史專家、毛澤東政治秘書李銳對**有如下評價：**晚年辦了兩件錯事，一是六四，另一便是長江三峽工程。

aaa181715 2011-6-15 10:17

2、苦肉計：肖秧請淹，加官晉爵

「苦肉計」，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三十四計，敗戰計其中之一。原文為：「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間以得行。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快速上馬

一九八〇年七月底，**視察三峽工程時，陪同考察的四川省省長魯大東

和萬州地委負責人，都向**反映了四川省委、省政府以及萬州地委對三峽工程的憂慮。之後，中共水利部和長江水利委員會提出一百五十米方案，表示只淹四川省萬州部份地區，不淹涪陵，也不淹重慶，顧及了四川省的反對意見，以致四川省也不好再多說什麼。至此，中共水利部和長江水利委員會的第一個目標實現了：一九八二年底，**為三峽工程開了綠燈。

一九八三年三月，長江水利委員會（當時稱長江流域辦公室）完成《三峽水利樞紐一百五十米方案可行性研究報告》的編製，於四月五日上報國家計委和水電部。五月三日至十三日，由國家計委主持，在北京召開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可行性報告審查會議。審查會認為：長辦提出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可行，並建議國務院批准。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七日，中共國務院財經領導小組召開會議。趙紫陽、萬里、姚依林、田紀雲、胡啟立、郝建秀、方毅、張勁夫、王任重、谷牧等中央領導人及各部委負責人出席。會議討論了水電部提出的「建議立即著手興建三峽工程」的報告，同時決定三峽工程採用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壩頂高程一百七十五米方案，並準備立即施工，爭取於一九八六年正式開工。會議還決定成立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李鵬擔任組長。

一九八四年四月，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原則批准了三峽水利樞紐一百五十米方案可行性研究報告，並要求立即進行部份施工準備工作。中共

中央指示：三峽工程按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壩頂高程一百七十五米設計。會議建議，成立三峽經濟特區。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中共國務院（八四國函字第五十七號）原則批准三峽工程一百五十米方案，決定在初步設計和工程概算未批准前，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兩年先進行部份施工前期準備工作，為爭取一九八六年主體工程開工創造條件。

建壩淹城一九八四年九月，當時還下屬於四川省的重慶市市委書記肖秧，以重慶市委與市政府的名義，向中共國務院提交了一份報告，要求將三峽水庫的正常蓄水位從海拔一百五十米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米，理由只有一個，一百五十米方案不能保證萬噸輪船從上海直達重慶。

興建三峽大壩，與重慶市有直接關係的，如：航運、港口、洪水淹沒、生態環境改變、水污染和移民等等。縱觀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為了改善航運條件，在黃金航道上建設高壩；更沒有在擁有幾百萬居民的大都市下游，建設高壩的先例。

瑞士環保組織「伯尼爾宣言」，曾假設在萊茵河瑞士和德國交界處建「三峽大壩」，結果是：水庫將淹沒蘇黎世和首都伯尼爾；而如果在羅納河瑞士和法國交界處建三峽大壩，則將淹沒日內瓦。此外，雖然從地貌和地質條件來說，德國萊茵河上的聖高瓦峽谷處（傳說中的萊茵河女妖所在地）十分適合建設高壩，但那將把德國的金融中心法蘭克福給淹了。

「萬噸輪船從上海直達重慶」，為一九五八年三峽工程規劃提出的工程目標。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准長江流域規劃中關於三峽工程的航運效益，論述如下：「長江幹流向來是我國水運中心，徹底改善此水運大動脈的關鍵問題是：三峽水利樞紐的興建。三峽水利樞紐建成後，不僅可以完全消滅三峽天險，使重慶以下河道變成平湖，而且由於三峽水庫對荊江水量的調節，穩定汛期河槽，利於刷新河床，增加水庫下游尤其是荊江河段的枯水水深，若再結合少量浚深工程，即可保持七一八米的水深，使重慶以下終年可通航萬噸江輪。如果三峽以上繼續增建其他水庫，當保證枯水季節下洩水量超過一萬一千立方米/秒，可保持九米航深，終年通行萬噸海輪！至於漢口以下河道改善，將以三峽樞紐為主創造條件，稍加整理，就可達到統一標準。」

當年出川前往法國留學，由於航運條件不好，中途不得不棄水路，而走旱路，因此終年通行萬噸海輪的目標，對於一九八二年為三峽工程開綠燈，存在重要影響。

萬噸輪船直達重慶？

二〇〇六年一月，重慶市副市長黃奇帆於上海舉辦「長江黃金水道開發與洋山保稅港區功能」會議上，批評南京長江大橋阻礙重慶發展，使萬噸輪船不能從上海直達重慶，應考慮將其拆除。而參加會議的南京市副市長蔣裕德則予以反駁。蔣裕德指出，把長江上的幾座老橋拆掉，實際上恐怕很難做到。現在南京長江大橋淨空為二十四米，萬噸輪船沒法通

過大橋開往中上游，這就使得南京港吞吐量大增。蔣裕德還說，南京長江大橋再用五十年也沒有問題。

此事於網上公佈之後，線民討論熱烈，有支持炸橋的，也有反對炸橋的。其實，即便把長江上所有礙航的大橋全部炸毀，在三峽工程全部建設完畢之後，萬噸輪船還是不能直達重慶。原因有二：第一，航道水深不足；第二，萬噸輪船無法通過三峽五級船閘和葛洲壩船閘。

要保證上海至重慶的長江航道終年通行萬噸輪船，三峽水庫枯水季節的下洩水量必須超過一萬一千立方米 / 秒，以增加大壩下游尤其是荊江河段的枯水水深；但規劃的三峽水庫枯水季節的下洩水量只有五千立方米 / 秒，根本不能保證荊江河段的航道水深。三峽工程五級船閘每級閘室的船隻最大吃水深僅為三點五米，而萬噸輪船要求的水深為九米，如何能讓萬噸輪船通過三峽大壩？況且，將三峽水庫的正常蓄水位從海拔一百五十米，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米，對重慶的弊端是非常之多，後果也非常嚴重。

增加重慶洪水危害

在建設三峽工程和葛洲壩工程之前，宜昌至重慶的長江河段，處於自然河流狀態，重慶實測最高水位為海拔一百九十二點八米，最低水位為海拔一百五十九點五米，最大水位變化幅度為三十三點三米，常年平均水位為海拔一百六十五點七米，所以當年在建設重慶火車站時，鐵路路軌的標高選在海拔一百九十六米，高於最高洪水位。

一九八一年，長江上游四川盆地的沱江、嘉陵江發生特大洪水，洪水之大，為歷史所罕見。寸灘的洪峰流量達八萬五千七百立方米 / 秒，為二十世紀最大洪水。宜昌站洪峰流量達七萬兩千立方米 / 秒。一九八一年，重慶最高洪水位達海拔一百九十四點三米（註：朝天門碼頭的洪水位記載為一百九十三點七米。），比一九八一年前的實測最高洪水一百九十二點八米，高出一點五米，距離重慶火車站一百九十六米高程，只剩一點七米，重慶多處城區被淹。

一九八一年的洪水造成四川省十四個地市的一百一十九個縣遭淹沒，受災人口達一千五百八十四萬人。肖秧請求中央將三峽水庫的正常蓄水位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米，如此，三峽大壩處的自然水位被人為地壅高了約一百二十米，那麼，如果出現類似一九八一年的洪水，重慶的最高洪水位還能保持在海拔一百九十四點三米嗎？

一八六〇年和一八七〇年出現的長江洪水，是根據歷史記載和洪水痕跡推算出來的史上最大洪水。一八六〇年洪水受災地區為屏山、豐都、萬縣、雲陽、巫山、巴東、秭歸（以上均在三峽大壩壩址上游）、宜昌、宜都、**和洞庭湖區。一八七〇年，洪水使三峽大壩壩址上游的合川「大水入城深四丈餘」，豐都「全城淹沒無存，水高於城數丈」。根據洪水痕跡計算，一八七〇年重慶的最高洪水位為海拔一百九十九點〇四米。如果在這「水高出城數丈」的大洪水上，再疊加三峽大壩壅水，那麼災情更是火上加油。

清華大學水利系黃萬里教授對水庫大壩工程的防洪效益，持批判觀點。黃萬里教授在〈怎樣決定三峽大壩是否修建〉一文中寫道：「造壩截斷沙流，使上游洪水抬高，氾濫頻繁；下游停止造地，灘塗侵蝕。」黃萬里教授指出：三峽大壩修成之後，將使來自金沙江與四川盆地河槽中的礫卵石和部份泥沙，在重慶沉積下來，形成水下堆石壩，堵塞重慶港，其壅水將淹沒合川、江津等城鎮（合川、江津為重慶上游的城鎮），殃成數十萬人淹斃的慘劇，故此壩永不可修。黃萬里教授更以一九八三年七月，湖北省丹江口水庫上游安康洪水慘案為例，說明三峽大壩對上游地區洪水嚴重危害的問題。

王小寧（註：北京網路作家，一九五一年生，因在電子郵件中推動多黨政治，被北京法院以「煽動顛覆」罪名判刑。）於〈西南中國的悲哀〉一文中指出，「一千多公里川江河道狹窄，對洪水下洩極為不利。對洪水下洩更為不利是從三峽到重慶的六百多公里川江上，還有多處峽口。這些峽口寬度只有二百至四百米，僅為正常江面寬度的幾分之一，兩岸高度在水面三百至四百米以上，坡度為七十度以上，有些地方乾脆就是直上直下。峽口就像瓶頸一樣，更加嚴重地阻礙洪水下洩。這些是四川地區洪澇災害頻繁的根本原因。大水遇峽口水流下洩受阻，就會出現壅水現象，水位急劇上漲。水位一直要漲到峽口上下有一個很大的水位差，從而使水流流速明顯加快，過水截面積明顯加大，來水量與下洩水量相等後才會停止上漲。每一個峽口都會使其上游水位明顯壅高。從三峽到重慶一共有六百多公里長，共有包括三峽的三個峽口在內的著名峽口十

三個。汛期大水，十三處峽口造成的壅水現象，使川江就像出現了十**臺階一樣。在這裏特別要注意的是，壅水是以下游的水位為基點抬高的。」

根據歷史洪水痕跡推測，一八七〇年重慶最高洪水位為一百九十九點〇四米。一九八一年實際測量的最高洪水位為海拔一百九十四點三米；自一九五八年以來，重慶的城市建設都控制在海拔二百米以上，均高於歷史最高洪水。自然狀態下的重慶防洪標準在百年一遇之上。所以重慶曾經是中國沿江大城市中防洪標準最高的。

但是，建設三峽工程之後，重慶的防洪標準是增高了、還是降低了？中共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沒有公佈任何資料。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峽開發總公司的金沙江溪洛渡大壩工程，正式開工，在新聞報導中，無意間透露出建設三峽工程之後，重慶市的防洪標準僅為二十年一遇。三峽工程的建設（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使得重慶市的防洪標準，從過去的百年一遇下降為二十年一遇，此一事實便說明，三峽工程的建設，加大了重慶的洪水威脅。

增加重慶港區泥沙淤積

從航運來說，將三峽水庫的正常蓄水位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米，對重慶港口最為不利，因為此時，三峽水庫庫尾的回水區正好位於重慶港口區，而水庫庫尾的回水區，正是泥沙淤積最為嚴重的地區。

來看看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做的重慶段，從青草背到剪刀峽模擬模型的結果：航道：回水變動區航道大部份得到改善，使用三十年內，萬噸船隊可直達重慶的朝天門和九龍坡；使用五十年左右，青岩子、九龍坡和金沙磧等河段發生河型轉化，每當枯水年水庫消落期，上述三個河段發生不同程度的礙航（航深小於三米屬礙航），礙航時間從十幾天到二個月左右（萬噸船隊只能在十一月至次年的三、四月通航五、六個月）。

港口：除重慶港區佛耳岩、長壽港未出現淤積邊灘外，其餘廠礦專用碼頭和地方碼頭淤積較多，其中九龍坡碼頭等，二十九年淤積邊灘約一百米，第四十九年碼頭邊灘最寬達兩百米，碼頭作業感到困難。嘉陵江臨江碼頭前沿邊灘達三百餘米（第四十九年），一至三號碼頭作業困難。到第七十六年年初，金家灘、臨江門和千廝門一帶都淤成寬大的邊灘，嘉陵江一至三號客運碼頭難以作業。

由此可見，在水庫運行開始的二十年，重慶港的淤積尚不十分明顯，但之後港區淤積日趨嚴重，港口被淤死，以致多數碼頭難以作業。那麼，當碼頭前沿出現三百餘米寬的沙灘時，這個碼頭還能生存下去嗎？

北京水科院也曾對一九五四年大洪水蓄洪至一百七十五米作過泥沙模型試驗，試驗結果顯示：重慶最大碼頭「九龍坡河段原主河槽基本被淤死，經兩年沖刷還未完全衝開，對航行條件不利」；「嘉陵江口的朝天門碼頭沿線出現嚴重淤積狀況，難於航行」。結果和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

的結果基本一致。

重慶的碼頭被淤之後怎麼辦？模型的試驗沒能提出什麼好的方案，來治理這些泥沙淤積。而在國務院的報告裏卻說，論證中重點對重慶市的影響，認為採取綜合措施後可以滿足航運的要求。這裏的綜合措施包括了航道疏浚，大規模的港口整治，挖掘泥沙和改變水庫的調度方式。不說這筆費用是否算到三峽工程的帳上，就是對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在未加分析的情況下，就得出了可以滿足航運要求的結論，是極不科學的。

就拿改變水庫的調度方式來說，水庫的運行方式一變，其他方面也都要變。具體地說，從減少重慶港和航道的淤積的角度來改變水庫的調度方式，就是要在汛期末推遲蓄水。在自然的情況下，川江每年汛期末都有一個走沙期，這時的水流含沙較少，流量又較大，能沖走一些在汛期中淤積的泥沙。但建了水庫之後，水流變慢，加上又要在走沙期開始蓄水，使得走沙期被壓縮或取消，不利於沖走淤積物，而造成部份航道礙航，重慶港口淤積。

如果推遲汛期末的蓄水，有利於將一些淤積物沖走，避免或減輕航道和重慶港口的淤積。但是如果把三峽水庫的蓄水期從每年的十月初推遲到十一月初，可能會對減輕航道和重慶港口的淤積有幫助，但如此又出現了新的矛盾。

量子風水 2011-6-15 10:22

记得本人 2008 年在爱得蒙顿那个动物园里发个一个帖子，说世界上没

有任何力量可以将三峡大坝 175 米的水位保持 20 年以上。结果被一帮红卫兵围打一通。

aaa181715 2011-6-15 10:27

第一，最直觀的就是，萬噸船隊的通航時間將從每年的五、六個月，減少到四、五個月；第二，如果再仔細研究一番，這個方案可能會使萬噸船隊直抵重慶的目標，化為烏有。每年十一月份，宜昌站的月平均徑流量只有二百六十三億立方米，除去要向下游提供必要的流量，已經不可能再有二百二十一億立方米的水供水庫存儲用了，這樣水位就到不了正常蓄水位一百七十五米，也保證不了萬噸船隊到達重慶的航運需要。

推遲蓄水，就會影響發電，也會影響對下游流量的補給。這個方法在目標不改的情況下，無法接受。剩下的只有工程整治一條措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錢便往下投就是了，淤多少，挖多少，反正這筆錢，不會算到三峽工程的投資上去。美國加利福尼亞貝克萊大學地質教授利奧帕德撰文說，長江三峽是世界上最大的實驗室，這裏進行的是一項未被證明能夠獲得成功的實驗。

破壞重慶市原有排水系統，增加甲烷爆炸威脅。在日常生活中，將用過的水排入城市排水管道中，然後又排入天然河流，是極為普通之事，重慶市的廢水，都排入長江。那麼，當長江在重慶處的水位抬高十幾米，重慶市的排水口都將被淹沒在長江水位之下，重慶市的排水受淹堵，排水不暢，這樣排水管道中將充滿沼氣，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因此，重慶水位的抬升，將迫使重慶必須改建全市的排水道系統。城市更新，城

市改建，這些項目對一個城市尚能承擔，但要迫使一個老城市改建全部的排水道系統，將在財政上難以負荷。

二〇〇七年夏，暴雨襲擊重慶市。此時，重慶市排水道系統的出水口水位，受三峽水庫蓄水影響而抬高，造成排水管道的實際水力坡度減少，排水系統能力大為縮減，致使重慶市區許多建築被淹，馬路被阻。增加重慶庫區水污染 影響周圍地區飲用水供應三峽大壩建設之前，長江水的流速比較大，河流自然淨化的能力非常強，而三峽工程的興建，使水的流速降低，自然淨化污水的能力也就降低，增加重慶庫區的水污染，影響周圍地區的飲用水供應。

一九九二年，於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三峽工程方案之時，四川省程貽舉、楊東喬等三十二位代表，聯名向大會主席團提交了一份「請求專題研究和評價三峽工程對重慶市的經濟和環境影響」議案。當時重慶市並未提升為中央直轄市，行政上還屬於四川省領導，四川省**代表團中包括來自重慶市的代表。

三十二位代表在議案中指出：「三峽工程不利影響主要在庫區。重慶港處於水庫回水變動區，三峽工程的建設與重慶市的經濟發展和環境有密切關係，但究竟影響程度有多深，範圍有多大，以前從未進行過系統的專題研究。世界上至今還沒有一座大型水庫是在一座特大型城市的邊上，國內外都沒有經驗可借鑑。儘管十多年來有關部門對三峽工程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環境評價、模型試驗，提出了一系列的報告，在報告

的一些地方也涉及到重慶問題。但我們認為，研究尚不深入、不全面，有些不利影響還估計不足，對策措施上還嫌籠統，不夠有力。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稍有失誤，給重慶市帶來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同時還會給子孫後代留下後患。」

同樣，重慶大學和四川科技大學，也對三峽水庫對重慶市的淹沒影響作過研究，得出了和三峽工程論證不同的結論。可見，直到一九九二年，四川省**代表，針對重慶市委書記肖秧以重慶市委和重慶市政府的名義，向中央政府要求將三峽水庫的正常蓄水位從海拔一百五十米增加到海拔一百八十米是一直持反對意見的，原因很簡單，加高三峽水庫的蓄水位，對重慶市危害很大。李銳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興建三峽工程議案後，給中央寫信，要求盡早為重慶準備後事。

為此，錢正英專門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到四川省代表團做工作，作解釋，錢正英擔保在建設三峽大壩之後，百年洪水不會影響重慶市。她說，中共中央政府同意在批准三峽工程議案之後，對重慶市的淹沒影響再做研究，也會邀請重慶大學和四川科技大學參加。希望四川省的代表們和中央保持一致，支援三峽工程的建設。四川省**代表不相信官拜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錢正英會欺騙他們；但是三峽水庫蓄水後的事實證明，正是錢正英欺騙了他們。

原四川省水利電力廳廳長、政協副主席張廣欽曾就三峽工程多次向中央上書，他以從事水利電力幾十年的經驗指出：有人說要保下游一千萬人

口，但三峽修好解決不了武漢一盆水問題，也解決不了荊江分洪問題，且目前對上游危害也考慮得不夠。長江主河流中段建大壩不可取，鯀治水的老路——堵的辦法，是效法不得的。

現代苦肉計

三國演義中周瑜火燒赤壁是最精采的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的戰例。赤壁大戰中東吳老將黃蓋上演一場苦肉計，讓曹操上當，功不可沒。周瑜打黃蓋，一個要打，一個願挨。板子打在黃蓋的屁股上，後來黃蓋立功，加官晉爵，也是獎賞分明。重慶市市委書記肖秧也上演了一場苦肉計，後來也從重慶市市委書記升到四川省省長。只是肖秧的苦肉計和黃蓋的苦肉計有一點不同，周瑜打黃蓋，黃蓋被打得皮開肉綻。而肖秧的苦肉計中，吃苦的不是肖秧，而是重慶市的居民和他們的子孫後代，這就是現代和古代苦肉計之區別。

但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肖秧雖然當上了四川省省長，但是在接下來的中共中央全會上，中央委員的選舉中，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罕有的幾名儘管通過差額選舉，卻被淘汰的候選人，致使心情不暢，憂鬱得病。縱然李鵬後來又將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的官銜送給他，但是也未能阻止肖秧早逝的命運。

aaa181715 2011-6-15 10:30

3 無中生有：高峽平湖，幾代錯誤

「無中生有」，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七計。原文為：「誑也，非誑也，實

其所誑也。少陰，太陰，太陽。」

向中國大河宣戰

一九八四年，李鵬擔任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把實現老一輩無產階級領導人「高峽出平湖」的夢想，作為歷史賦予的重任。

中國皇帝，多喜歡治水。也許是受大禹、隋煬帝、或者是康熙、乾隆爺的影響，認為治水能名垂青史，毛澤東在入主北京之後，便先後向中國的幾條大河宣戰。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至二十二日，毛澤東乘「長江艦」從武漢至南京，視察長江，在「長江艦」上聽取林一山（註：林一山，中國著名水利學者。為三峽水電站主要支持者，並參與葛洲壩等一系列水電站設計工程。）關於長江問題的彙報。討論防洪問題時，毛澤東問：「費了那麼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庫，還達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為什麼不集中在三峽卡住它呢？」因之，以三峽大壩卡住長江洪水，畢千功於一役，便是出自毛澤東的主意。（註：雖然孫中山、美國工程師薩凡奇等，在毛澤東之前都提出過在三峽建壩的建議，但是建壩的目標完全不一樣。孫中山的建議是為了改善航道，其次發電；薩凡奇提議建設三峽大壩，主要是發電，用於生產化肥。）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邀請蘇聯專家，幫助編制長江流域、以及三峽大壩

工程的規劃與設計。然而，蘇聯專家和中國專家，在大壩選址以及水庫蓄水位等問題上，發生分歧，針對蓄水位高度，蘇聯專家提出海拔二百六十五米，而林一山則提出海拔二百三十五米的規劃。

為何中蘇專家在方案上有如此大的分歧？這得從水庫的功能談起。在河道上建造擋水壩，形成蓄集水的空間，便是水庫。水庫其中一個功能為調節河流的徑流，集中落差，以滿足發電或供水等需要。用三峽水庫防長江洪水，是毛澤東的主意。

水庫蓄水位越高，集中的落差越大，對發電越有利；但此時對於防洪最為不利，因為水庫防洪庫容接近零，防洪的效益最差。同時蓄水位越高，水庫淹沒的地區越大，淹沒損失越大，移民越多。水庫大壩的最主要技術資料有大壩頂高，水庫最高蓄水位，最低蓄水位，水庫總庫容，死庫容，有效庫容。最低蓄水位之下的為死庫容，是不能調節的庫容，只為保證發電機組所需要的最小落差用。最低蓄水位和最高蓄水位之間的庫容為有效庫容。有效庫容又分成：興利庫容和防洪庫容。

那麼檢驗水庫功能的重要技術資料，就是：水庫總庫容、和壩址處多年平均徑流量的比例，以及有效庫容和多年平均徑流量的比例，比例值越大，水庫調節徑流的能力越大。比如：世界著名的阿斯旺大壩的總庫容為一千六百八十九億立方米，其中死庫容三百一十億立方米，有效庫容一千三百七十九億立方米，多年平均徑流量為九百〇九億立方米，總庫容和多年平均徑流量的比值為一點八六比一點〇，有效庫容和多年平均徑流量的比值為一點五二比一點〇。壩址千年一遇洪水總量為一千三百

四十億立方米，有效庫容一千三百七十九億立方米，有效庫容大於千年一遇洪水總量。

蘇聯專家提出蓄水位海拔二百六十五米，主要是從滿足中國政府提出的工程目標出發，在三峽把長江洪水卡住，防千年一遇的洪水；但卻不考慮重慶市是否被淹，也不考慮淹沒的損失。林一山則是犧牲一部份防洪和發電效益，來保證重慶市市中心不被水庫淹沒（重慶市市中心的高程在海拔二百四十米），但重慶市其他城區，仍然得被淹沒。

毛澤東泳後抒懷

一九五六年六月，毛澤東在武漢長江泳後，寫下了「水調歌頭·游泳」，詞中寫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今世界殊。」出自浪漫的描寫，竟成為幾十年來興建三峽工程的最主要依據。

一九五九年，長江水利委員會編制、後經中共國務院批准的「長江流域綜合利用規劃報告」，其中〈為什麼必須以三峽為主體進行流域規劃呢〉一節中寫道：「這幾句話，概要地說明了這一偉大河流上主體工程的前景。這是因為三峽樞紐在防洪、發電、灌溉與航運等主要的綜合利用方面是指標優越和對全江有顯著影響的工程。」他們解釋：「更立西江石壁」說的是發電，「截斷巫山雲雨」指的是防洪，而「高峽出平湖」為的是航運。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對三峽水庫的蓄水位做出了決定：海拔二百米。這是周恩來的決定，他既不同意蘇聯專家，也不同意林一山的意見，蓄水位遠遠低於中蘇專家的建議。那麼周恩來做出這個決定的依據是什麼？就是重慶朝天門碼頭的最高一臺階的高程。這樣，重慶市市中心不被水庫淹沒，重慶市其他城區也不被淹沒。

朝天門碼頭最高一臺階的高程海拔二百米，三峽水庫的蓄水位海拔二百米。朝天門碼頭到三峽壩址的距離為六百多公里，水準如鏡，沒有水位差，這也就是毛澤東所夢幻的「高峽出平湖」。從此，重慶市和三峽地區的一切基本建設都控制在海拔二百米之上（一九七一年，中共中央決定葛洲壩工程上馬之後，重慶市和三峽地區海拔二百米的基本建設控制線便不存在，因為當時決定，上了葛洲壩工程後，就不再建設三峽工程）。

aaa181715 2011-6-15 10:35

蓄水方案

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三峽工程做了三個不同蓄水方案比較，海拔二百米、海拔一百九十五米和海拔一百九十米。比較的結果是：一百九十五米方案的防洪和發電效益都不能滿足要求，而經濟效益也不如二百米方案。一百九十米方案則比一百九十五米方案還要差。筆者於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閱讀了五十年代關於此三個方案的比較，發現那時的科技工作者，遠比文化大革命後的要誠實許多。其實從當時三個方案比較的結果，便可以看出**所贊成的一百五十米方案，是一個騙人的方案。就是現在批准的一百七十五米方案，也同樣是騙人方案。林一山在一九

九二年聽到全國**批准三峽工程方案時，相信最後的三峽工程會回到二百米方案（註：參見盧躍剛〈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中國作家》一九九二年第六期。）。

毛澤東建三峽水庫，欲畢千功於一役，用三峽大壩卡住長江洪水，蘇聯專家的二百六十五米方案是用一個軍的兵力，林一山的二百三十五米方案是用一個師，二百米方案則是用一個團，現在批准的一百七十五米方案是用一個營，**所贊成的一百五十米方案只用一個連，一百二十八米的預備方案只需一個排。似乎不管三峽水庫蓄水位多高，防洪庫容多大，都能保護下游地區免受滅頂之災。

李鵬擔任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至十四日帶領李伯甯、陸佑楣等，到重慶和三峽地區考察。回來之後，向中共國務院交了一份報告，建議將三峽水庫蓄水位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米。如此可以完全控制長江中下游百年一遇的洪水，發電轉機增至一千八百萬千瓦，當發電量增加到九百多億千瓦時，重慶以下川江條件大為改善。其不利條件是淹沒面積增加一倍，移民總數增加二倍。

為什麼把蓄水位定在海拔一百八十米呢？李鵬寫道：自一九五八年以來，重慶的主要建設項目都安排在一百八十米以上；「一百五十米方案」涪陵基本不淹，「一百八十米方案」淹沒約三分之二；「一百五十米方案」萬縣將淹掉百分之五十，「一百八十米方案」淹掉百分之八十；萬縣以

下縣城，「一百五十米方案」已幾乎全部被淹。淹沒的實際損失，並不與淹沒區的擴大成比例增加。李鵬還是堅持「高峽出平湖」的觀點，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蓄水位海拔一百八十米，三峽水庫庫尾處重慶的水位也保持在海拔一百八十米。李鵬向中央提出將三峽水庫蓄水位提高到海拔一百八十米最主要的理由是：重慶市黨委和重慶市政府本身有這樣的要求。

「高峽出平湖」？

在宣傳三峽工程的電視片中，人們常常看到電腦類比模型，六百多公里長的三峽水庫水位上升，直至海拔一百七十五米處停住，形成一個高峽中的「平湖」。「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蓄水位多高，三峽水庫庫尾處的水位也多高」，三峽水庫是個沒有水力坡度的平湖，這個觀點貫穿在三峽工程的淹沒計算和移民安置計畫之中，也貫穿在三峽水庫周邊地區的一切基礎設施建設之中。

一九九二年全國**批准了三峽工程。之後在風景秀麗的長江三峽地區，出現了一條世界上最長的紅色警告線，這就是三峽大壩工程的移民遷移線。這條延伸在長江兩岸的紅線共有一千多公里長。三峽地區的居民，到底搬遷還是不搬遷，就由這條紅線說了算。居住在這條紅線以下的人們，必須為三峽工程、為「國家的利益」作出犧牲，在限制的時間內遷家挪墳。三峽工程公佈的移民一百一十三萬人，就是以這條紅線確定的。

這根紅線是依據三峽工程論證移民組資料所繪製的。原全國政協委員陸

欽侃先生，給筆者寄來以下這張表：當長江流量在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三峽水庫蓄水於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時，大壩上游三峽水庫各地的水位為：

aaa181715 2011-6-15 10:40

違逆水性

「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蓄水位多高，三峽水庫庫尾處的水位也多高」這個理論，完全是「無中生有」，既沒有先人的經驗證明，也沒有現代科學理論的支持。

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李鵬認為，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的蓄水位海拔一百八十米，三峽水庫庫尾處重慶的水位，仍然是海拔一百八十米；但兩地的距離有六百多公里，兩地水位一樣高，這水怎麼流？

中國的聖人孟子，對水往低處流的道理，有十分精采的論述：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天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這段文字的意思是：告子說：「人性就像那急流的水，缺口在東便向東方流，缺口在西便向西方流。人性無所謂善與不善，就像水無所謂向東流向西流一樣。」孟子說：「水的確無所謂向東流向西流，但是，也無所謂向上流向下流嗎？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人性沒有不善良的，水沒有不向低處流的。當然，如果水受拍打而飛濺起來，能使它高過額頭；加壓迫使它運動，能使它流上山崗。這難道是水的本性嗎？是形勢迫使它如此的。人，可以迫使他做壞事，本性的改變也是這樣。」

不讀聖賢書，構成了知識的最大缺陷，也是陷入迷途，常犯錯誤的原因。重慶水位六百多公里之外的三峽壩址處一樣高，水不往低處流，不就正是違反了自然規律？

用現代科學理論解釋：世界上任何物質的移動，都要消耗能量。水從高處往低處流，就是把位能轉變為動能、熱能的過程，水流運動要消耗能量。水在任何一點的能量，是由其動能和位能所組成的，動能表現在水流速度上，位能表現在其高度上，在水庫沿程取任何一點為A點，在一點的上游取一點為B點，如果水流速度在A、B兩點相等，那麼，B點和A點之間的位能差（高度差），就是水滴從B點運動到A點所消耗的能量。

計算庫區沿程水位的高低，由於庫區沿程各斷面水力因素（如斷面、水力半徑、流速等）變化複雜，難以用簡單的函數關係表示，則對其採用分段積分求和的方法，即應用伯努利方程逐段計算。

從伯努利方程中可以看出，只要水在流，有流速，有流量，坡降平均值就不可能為零。如果兩個斷面的流速相等，只要坡降平均值不為零，在 B 處的水位就要比在 A 處高。如果 B 點水位和 A 點水位相等，B 點的水位和 A 點之間就沒有水流存在。如果 B 點和 A 點之間沒有水流存在，三峽水庫又依靠什麼發電？

aaa181715 2011-6-15 10:43

三峽水庫長六百餘公里，水力坡降平均值不可能為零，所以，三峽水庫庫尾處重慶的水位，就必然要比三峽大壩處的水位高，兩處的水位絕不可能是像李鵬所說的那樣是一般高低。

一九九八年長江發生洪水時，曾陪隨李鵬考察重慶的三峽總公司總經理陸佑楣對媒體說：「要是有了三峽工程，何愁長江洪水逞兇狂。」筆者曾於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北明（註：北明，自由撰稿人。目前為自由亞洲電台「華盛頓手記」專題節目主持人。八九民運期間，與包遵信等自由派知識分子一起工作，參與了天安門廣場重要報紙《新聞快訊》的編輯和採訪工作。八九年以後入獄、逃亡。一九九三年流亡美國後，曾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大路》雜誌做助理編輯並任《新聞自由導報》專欄作家。）採訪時，談及三峽水庫防洪作用和淹沒問題：以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泥沙組，萬分之〇點七來平均水力坡度，計算三峽水庫淹沒，當三峽水庫利用其二百二十一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發揮防洪效益，蓄水位至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時，則三峽水庫末端的重慶市（距大壩壩址六百餘公里處）的淹沒水位，並不是如李鵬所說的：壩址處水位多高，重慶

市水位就有多高。

萬分之〇點七來的水力坡度，相當於一千米距離升高七釐米，一百公里距離升高七米。如此：六百公里乘以萬分之〇點七，再加一百七十五米，等於

二百一十七米。海拔二百一十七米，超過周恩來一九五八年定的重慶朝天門碼頭最高一級臺階的高程！

重慶部份城區被淹，進出重慶的火車線被淹（重慶火車站高程海拔一百九十六米），進出重慶新修的高速公路被淹，用防護堤保護的涪陵舊城中心被淹，萬州幾乎全部被淹，開縣和興山線）用防護堤保護的城區被淹，石寶寨被淹，重新搬建後的張飛廟被淹，新建的三峽移民新居被淹……

北明的採訪在《華夏文摘》一九九八年九月四日第三百八十八期發表之後，一位名叫伊文的讀者，給《華夏文摘》編輯部寫了一封信，也發表在《華夏文摘》上（《華夏文摘》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一日第三百八十九期）：到這裏我真的懷疑這位王水利專家（編者：指本書作者王維洛博士）的水準，怎麼竟會把重慶的水位給算錯了。照他這麼一算，重慶的水位就變成了兩百一十七米，那麼重慶真的被淹得差不多了。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真的從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瘋子，否則怎麼會讓這樣愚蠢的工程上馬呢？只要稍有流體力學或者水力學基礎的人都知道，水庫基本是沒有比降的，也就是說水位是平的，只是在庫尾及其上游才有

比降。

從伊文的來信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資訊：如果水庫的水面不是平的，不是高峽出平湖，那麼這個錯誤就大了。「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真的從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瘋子，否則怎麼會讓這樣愚蠢的工程上馬呢？」

高峽出斜湖

二〇〇三年六月三峽水庫開始蓄水前，長江水利委員會發表了三峽水庫蓄水至海拔一百三十五米時，大壩上游三峽水庫各地的水位：當三峽水庫蓄水至海拔一百三十五米時，庫區二十年一遇（七萬兩千三百立方米 / 秒）的來水設計回水水面線為：

根據這個資料，三峽壩址處的水位海拔一百三十五米，距離距三峽大壩壩址四百九十三點九公里的涪陵李渡鎮，水位並非海拔一百三十五米，而是一百六十九點四，水位上升三十四點四米，約五百公里的距離，上升三十五米，平均每一百公里上升七米。

二〇〇三年六月，三峽水庫開始蓄水，此時形成的三峽水庫不是平湖，而是一個有水力坡度的斜湖。長江水文局在蓄水的頭幾天，在網際網路上公開發表三峽水庫一些水文站的實測水位，但幾天之後，就不再繼續

發表水位資料。

aaa181715 2011-6-15 10:46

無中生有

二〇〇六年十月，三峽水庫蓄水至海拔一百五十六米，為了達到這個蓄水位，三峽工程一共搬遷了一百二十三萬移民，而批准的三峽工程計畫為：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移民一百一十三萬人。二〇〇六年八月起，長江水利委員會開始調查海拔一百七十七米以上需要搬遷的移民，包括已經安置的三峽移民。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對此發表看法：「三峽工程的最大問題其實是當初的科學論證做得不夠完善，使得現在三峽大壩建好後，才發現有些地段淹沒的水位比原先預計的要高出許多，使一些已經建好的新移民點，現在又得搬遷，造成資金的重複浪費。（註：參見《新聞晨報》〈三峽工程又爆貪腐黑洞：展露冰山一角〉，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南方日報記者趙世龍，於〈高峽蓄水出斜湖〉一文中寫道：「這個問題的成立，那現在劃的一百七十七米蓄水移民紅線的做法，就大錯特錯了，很多沒有計入移民遷建的城鎮村舍都要重新面對這個棘手的問題。這個問題最早還是由國外的學者公開提出來的，可惜一直到最近才得到重視。……蓄水成庫後的事實，已證明沒有水力坡度的說法的錯誤。……在萬州，蓄水移民線被大大往上提了。這說明，在三峽工程上馬前，相關論證工作做得遠遠不夠，或者說根本就在排斥反對意見，這又從另一

層面說明**的制度與尊重自然、科學的重要性。」

而二〇〇三年六月以來，三峽水庫蓄水的實踐，恰恰證明：高峽出平湖，根本是無中生有。「水無有不下」本是自然規律，但是毛澤東的一句詩句，一根三峽移民淹沒紅線，讓十幾億中國人都相信這根本不可能存在的「高峽平湖」。

即便到了二〇〇六年十月，三峽水庫壩址的水位上升到海拔一百五十六米，庫水淹沒了已經安置在紅線以上的移民住房時，還有人相信，當三峽水庫壩址的水位上升到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時，會出現一個真正的「高峽平湖」。

aaa181715 2011-6-15 10:49

4 調虎離山：花瓶波瀾，取消資格

「調虎離山」，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十五計。

原文：「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誘之，往蹇來返。」

違反憲法

為了支援三峽工程統一領導建設，李鵬在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就提出建立三峽省，為此，必須先行組建一個籌備組。一九八五年二月，三峽省籌備組正式成立，李鵬親自到會講話。陪隨李鵬考察重慶的李伯甯出任三峽省籌備組組長。隨即發佈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成立三峽省籌備組的通知〉。計畫成立的三峽省包括：湖北省宜昌

市和宜昌地區，湖北省恩施地區的巴東縣，和四川省萬縣市和萬縣地區，基本是一百五十米方案所涉之區域。

省政府的駐地為宜昌市。有人把三峽省稱為不三（峽）不四（川）省。其實，中共中央、國務院設置三峽省籌備組是越權，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根據憲法規定，這個權力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不在國務院，更不在中共中央。一九八六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將三峽省籌備組，改為國務院三峽地區經濟開發辦公室。三峽省籌備組的壽命僅為一年多。三峽省籌備組組長李伯甯因而對這個決定耿耿於懷。這是後話了。

每年三、四月，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舉行全會的時間。一九八五年，參加全國政協六屆三次會議的許多政協代表，對中共中央、國務院在沒有徵求全國**和全國政協的意見、沒有工程可行性報告的情況下，擅自批准三峽工程一百五十米方案，並決定於一九八六年開工，有很大的意見。政協委員、原交通部副部長彭德說：「一九八四年國務院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主上派占了上風，中央領導也表示支持，大有山雨欲來之勢。一九八五年全國政協會議上，交通部的幾位委員不謀而合，都想說說三峽工程，但當時大家心存顧慮，擔心中央已經決定，講了又有什麼用。在第一組的會議上，我按捺不住提出，三峽工程尚未論證清楚，急於開工有很大的風險，建議暫緩上馬。我的意見獲得了小組七十二名成員的一致擁護，大家推薦我到大會講。有的同志還鼓勵我說：『你去講，開除黨籍我們保你。』那時我已經沒有什麼職務，也沒有什麼官

可以罷了，便在大會上說明自己的觀點。」當時彭德副部長手持的尚方寶劍，就是周恩來總理當年的指示：「如果因修大壩影響了長江航運，就要把大壩炸掉。」這屆全國政協會議共有一百六十七位政協委員，對三峽工程問題單獨或聯合提出十七件提案，建議緩上三峽工程。

多數委員們認為，國務院必須對三峽工程進行工程可行性論證後，才能做決定。為此，全國政協組成三峽考察團，以九十三歲的全國政協常務、經濟建設組組長孫越崎為團長，從五月三十日起，對三峽地區進行了三十八天的考察。孫越崎為國民黨元老，原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副委員長、委員長、經濟部長，曾在國民政府負責三峽工程規劃。考察結束後，他們編寫《關於三峽工程問題的調查報告》，《報告》結論是：三峽工程近期不能上。該報告對三峽工程的投資、防洪、泥沙淤積、航運、發電、移民、安全等七個方面的問題，提出了三峽考察團的意見，還附上幾個專題報告：

- 一、三峽工程二百億打不住，可能要突破六百億；
- 二、關於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
- 三、三峽工程對航運利少弊多；
- 四、關於三峽工程的發電效益；
- 五、三峽水庫會不會給子孫後代留下一個「駝背長江」；
- 六、重慶市為什麼提出一百八十方案？

aaa181715 2011-6-15 10:52

一九八八年，全國政協再次組織三峽考察團，這次參加的全國政協委員

有一百二十八人，團長是政協副主席周培源。全國政協中，對三峽工程持不同意見的代表人物除周培源、孫越崎外，還有如：原國家計委副主任林華、原中國銀行副行長喬培新、原交通部副部長彭德、原商業部副部長王興讓、原國家水利部長遠規劃處副處長、總工程師陸欽侃等人。政協委員來自各方，且不少都是專家，全國政協的優勢即在於，委員們各方知識的有機組合，得以對三峽工程做出全面和公正的評價。

「不說實話」？

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物理學家，早年留學美國和德國，曾師從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其後在事業上也頗有建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中國科協主席等職務。在這之前，周培源一直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可是，在三峽工程決策問題上，他選擇以自己的眼睛、自己的頭腦去觀看事物、思考問題。

周培源從解剖自己開始：為什麼在五十年代，是個長江三峽工程積極的支持者，但到了八十年代，卻站到對立面去了？當時是從狹隘的愛國主義出發：「我在五十年代曾是三峽工程上馬的積極分子，那時主要是看了我們自己選的三斗坪花崗岩壩址，比過去薩凡奇所選的南津關石灰岩壩址要好的多，其他方面未作研究。近幾年來，因多看了些材料，多作了些瞭解，特別是政協經濟建設組作了詳細而切實的調查，使我認識上有了很大轉變。我覺得這個問題關係國家千年大計，必須慎之又慎。」（周培源，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

周培源通過親身的經歷，發現搞三峽工程的人不說實話。他回憶說：「有一次我乘船過葛洲壩船閘，葛洲壩的一位同志陪我，我問他：『過船閘要多長時間？』他們說：『四十五分鐘。』我上駕駛台，又問船長，他說：『一般要四個小時。』因為通常要待船把閘填滿後一起過。我們政協委員會會的船，當然到了就過閘。所以他們說話，總要和實際差別很大。」

「我們怎麼放心把三峽工程交給那樣說話辦事不誠實的人呢？」周培源先生還說：「他們的一些作法，很不科學，很不老實，如工程預算，對外講三百個億，內部講三百六十一個億，少說六十一個億，這決不是粗心。為了上馬，他們有意把投資說小，以後超出了，可以說是別的什麼原因，不是自己的原因。」搞三峽工程的人不說實話，這真是一針見血。周培源多次給中共中央領導寫信，建議推遲對三峽工程的決策。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前，戴晴女士編輯出版了《長江，長江》一書，被公認為向中央決策層叫號，為該書作序的正是周培源。天安門事件後，周培源未對三峽工程公開發表意見。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三日，江澤民和李鵬在接見參加三峽工程論證彙報會的代表後，設宴招待與會的**人士，周培源在飯桌上，提到三峽工程一些問題還未研究透，再次勸阻中央決策層，不要貿然行事。一九九四年，周培源去世，喪事十分簡單，在官方的生平介紹中，不提這位緊跟共產黨幾十年，到晚年選擇反璞歸真，在三峽工程上與共產黨分道揚鑣的科學家的活動軌跡。

政治問題

對於三峽工程，全國政協不和黨中央、國務院保持一致，這在政協歷史上還是頭一回。一九八六年趙紫陽向**彙報：「看了三峽後認為有三個問題：技術、經濟、政治。技術經濟問題都可以解決，難辦的是政治問題。一些反對的同志，並不是這個方面的專家，有的主要是對共產黨有意見。如果將來**審議時，有三分之一棄權或反對，就成了政治問題。」**的回答說：「上有政治問題，不上也有政治問題，不上的政治問題更大。」註：參見〈**與三峽工程〉，《炎黃春秋》九四年第三期。

aaa181715 2011-6-15 10:55

按照西方決策理論，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是工程技術問題，而三峽工程決策是政治決策；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通過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為政治家的決策做工程技術準備，而政治家則是出自政治考慮，權衡各方面利弊，做出最後的決策。但是在中國，關於三峽工程的爭論，從一開始就是政治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反對三峽工程，不能不提到一個人，他就是政協委員陸欽侃，他可以說是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技術總顧問。陸欽侃早年就讀於浙江大學土木系，畢業之後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就職，工作重點是長江開發以及長江洪水問題。一九四四年五月，美國墾務局總工程師薩凡奇前往中國三峽地區考察，就是由陸欽侃陪同。考察結束後，薩凡奇提出了揚子江開發計畫。

一九四六年，根據中美政府合作協定，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派遣五十四

人到美國丹佛學習三峽工程設計，陸欽侃是其中之一。在美期間，陸欽侃取得科羅拉多大學水利系碩士學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陸欽侃於水電部從事水電規劃工作，曾任水電部副總工程師，規劃局處長。五十年代，毛澤東提出建設長江三峽大壩，陸欽侃作為水電部派駐長江水利委員會的代表，專門負責三峽水力發電和長江洪水計算。一九五八年二月，周恩來到三峽地區考察，陪同的有李富春、李先念、李葆華、劉瀾波、張含英、錢正英、張勁夫、劉西堯、胡耀邦、林一山、李鎮南、閻紅彥、王任重、李銳、蘇聯水電專家和中國工程師，陸欽侃就是其中之一。

從一九三六年起，整整六十多年的時間，陸欽侃一直和長江、三峽工程打交道。可以說，陸欽侃是中國真正的長江專家，對長江問題的瞭解，無人能出其右。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委託水力部組織對三峽工程的可行性研究，陸欽侃擔任防洪組顧問。據說建設三峽工程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一勞永逸地控制與解決長江洪水，可見長江洪水在論證中的重要性。而出任三峽工程論證防洪組顧問，對陸欽侃先生來說，是一次機會，更是一次挑戰。如果陸欽侃能積極配合，作出令中共中央領導滿意的論證，要獲得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的頭銜，並非難事。

陸欽侃的同事徐乾清出任防洪專家組組長，後來被挑選為工程院院士。而由於陸欽侃先生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解決長江洪水問題，主要還是要靠長江堤防，並加固加高堤防，完

善分洪區等等。陸欽侃，便成了那個「唱反調」的人。

拒絕簽字

陸欽侃先生從長江三種不同類型的洪水出發，分析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

長江洪水的第一種類型是：一九五四年型的全流域型洪水。一九五四年洪水，是近百年來實際測到的最大洪水，七八兩月的洪水總量為四千五百八十七億立方米，超出堤防洩量一千〇三十二億立方米。建造三峽工程，僅能控制上游川江的洪水，對中下游湘資沅澧和漢江贛江等眾多支流不能控制。陸欽侃先生認為，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僅能減少城陵磯以上的分蓄洪水量二百億立方米，對城陵磯以下的江段，如武漢、安徽、江西，沒有實際效益。而只要按照一九八〇年批准的長江中下游防洪規劃，加固加高長江堤防，就可以增加洩洪量五百億立方米，再加上完善分洪區的措施，便得以基本解決此類長江洪水問題。

第二種類型是一九八一年型的長江上游洪水，對這類洪水沒有必要興建三峽大壩，建了大壩，只會增高上游的洪水位，有害無益。

第三種類型是發生在長江中下游的洪水，三峽工程對此也無防洪效益。

一九八八年，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完成，參加論證的有四百一十二名專家，其中四百〇三位在各自參加的分報告上簽字，陸欽侃等九位專

家，則是拒絕簽字。陸欽侃先生還專門提出個人意見報告，陳述拒絕簽字的理由。陸欽侃特別指出，只強調三峽工程的防洪效益，而忽視長江堤防的維修和加固，終將鑄成大錯。

陸欽侃當然知道，不在論證報告上簽字，是會被看作對竭力支援三峽工程的中央領導人的叫號。他也知道不簽字的後果。但是他寧願相信，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人已經吸取了教訓，荒唐的事不會再重複。既然科學的春天已經到來，為什麼還要懼怕嚴冬的寒酷？

aaa181715 2011-6-15 10:59

這段時間裏，陸欽侃在許多書刊上發表文章，陳述不贊同三峽工程的理由。他和其他政協委員一起，揭露了一九七五年河南板橋、石漫灘水庫和其他五十餘座水庫潰壩，造成二十三萬人死亡的事實。這次水庫潰壩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人數，是一九五四年長江洪水死亡人數的七倍。而這個被中共掩蓋了十二年的悲劇，至此才終於揭開冰山的一角。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一些人把陸欽侃等政協委員反對三峽工程、接受戴晴等人採訪、以及在戴晴主編的書中發表文章之事，上綱上線，並給其所在黨委寫信寄材料，供「單位在清查和考察幹部時」參考。陸欽侃等人因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一九九二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審批討論三峽工程提案時，陸欽侃等也沒有發表不同意見的機會。就在一九九三年全國政協換屆時，來自共產黨的全國政協委員如原計委副主任林華，原中國銀行副行長喬培新，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胥光義，原交通部副部長彭德，原商業部副部長王興讓等，因

在公開場合反對三峽工程，以致被取消全國政協委員資格。

這是共產黨的紀律。對反對三峽工程的**黨派代表，讓其繼續留任，如周培源、孫越崎、陳明紹、羅哲文等，此為共產黨的統戰路線。陸欽侃，一介書生，是無黨派人士，根據統戰路線，本應該按照**黨派人士的辦法處理。但有些人對陸恨之入骨，尤其陸為長江洪水問題的權威，說話有份量，有人相信。所以就把陸欽侃按照共產黨紀律的辦法處理，取消陸的委員資格，理由是已經連任兩屆，不宜再續任全國政協委員。

從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到一九九八年八月，陸欽侃沒有、也不能再於公眾場合對三峽工程發表不同的意見。而為了讓老人能度安定晚年，陸欽侃的子女們出面拒絕所有新聞界的採訪要求。

人為災難

一九九八年，長江大洪水，被一些新聞媒體稱為「世紀洪水」。這場災難，是天災還是人禍？江澤民在一九九八年抗洪勝利的總結表彰大會上特別強調指出：「今年發生這麼大的洪水，主要原因是氣候異常、降雨集中。也就是說，主要是天災造成的」。

這時，陸欽侃再也坐不住了，他接受了南方週末報記者的採訪，指出：造成一九九八年洪水災害的主要原因是人禍，是這些年來忽視長江堤防的維修和加固的結果，是這些年來，生態環境被破壞，水土流失的結果。這個災難性的結果，正是陸欽侃在十年前，陳述拒絕在三峽工程可行性

報告上簽字的理由時已經告示過世人的。這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歷史的必然。

陸欽侃指出，一九九八年的洪水並非什麼「世紀洪水」，它的洪峰流量比一九五四年的洪峰流量要小許多，從洪峰流量來看，還不到二十年一遇的洪水。一九九八年，當宜昌洪水流量還沒有達到常年洪水流量時，沙市的水位就接近歷史最高水位，這就說明，長江流域水生態環境被破壞得十分嚴重。一九八〇年制定的長江中下游防洪規劃制定的目標，特別是加固長江大堤的工作，原計劃必須在一九八五年完成，可是到一九九八年還沒有完成，這不是人禍，難道是天災？

南方週末報以一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採訪陸欽侃的報告，在全國引起很大的迴響。一九九八年洪水之後，中共國務院不得不重新採納陸欽侃等的意見，把長江防洪的重點，重新放到加固加高長江大堤上，放到退耕還湖、恢復河流和湖泊的自然蓄洪能力上，放到在中上游地區的植樹種草和水土保持上。

二〇〇〇年全國**政協會議期間，由已經不是全國政協委員的陸欽侃先生組織起草的「關於三峽工程初期按一百五十六米蓄水位運行，驗證泥沙淤積，緩解移民困難的緊急呼籲書」由全國五十三名知名學者簽名，遞交中共中央領導人，在當時引起巨大反應。

調虎離山

調虎離山，原出自明朝馮惟敏《海浮山堂詞稿二上玉芙蓉（共二）》。原文為：使不了調虎離山計，當不得將軍八面威。虎是指強有力的對手，山是指有利於對手的地形和條件。如果將老虎從有利的地勢調開，這樣就有利於戰勝對手。

全國政協委員陸欽侃是中國真正的長江問題專家，也是最早從事三峽工程規劃的工程師，學問好，威信高，是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技術總顧問，對三峽工程主上派來說，陸欽侃顯然是最強的對手。同樣，原計委副主任林華，原中國銀行副行長喬培新，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胥光義，原交通部副部長彭德，原商業部副部長王興讓等，都是共產黨內各行各業的專家，他們對主上派而言，也都是危險人物。撤銷這些人全國政協委員的資格，使其失去全國政協的平臺，沒了資訊來源，無聚會可能，失去發言機會，更沒了視察的資金，如此，便也沒了要求中國務院各部門對反對派提問，做出答覆的權力。此乃主上派之調虎離山，以利三峽工程上馬。

aaa181715 2011-6-15 11:03

5 欲擒先縱：結論已在，故作論證

「欲擒故縱」，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十六計。原文為：「逼則反兵，走則減勢。緊隨勿迫，累其氣力，消其鬥志，散而後擒，兵不血刃。需，有孚，光。」

決策鬥爭

一九八六年三月，**接見美國《中報》董事長傅朝樞時表示：對興建三峽工程這樣關係千秋萬代的大事，中國政府一定會周密考慮，有了一個好處最大、壞處最小的方案時，才會決定開工，是決不會草率從事的。 **的講話否認了中共國務院一九八四年原則同意興建三峽工程一百五十米方案、並爭取一九八六年正式開工的事實，也否認國務院曾發佈八四國函字第五十七號檔的事實。

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李鵬在六屆**四次會議第二次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三峽工程是具有防洪、發電、航運等綜合效益的一項偉大工程，中國政府對這個工程的態度，總的講，第一是積極的，第二是非常慎重的。現在還沒有就這項工程是不是正式開工作出決定。國務院準備成立一個專門的三峽工程論證委員會，不僅要吸收國內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參加，聽取他們的意見，還要向其他國家有水電建設經驗的專家們進行諮詢，聽取意見。論證的情況，委員會將及時向全國**常委會彙報，同全國政協協商。」

李鵬回答記者提問時，也否認國務院在一九八四年原則同意興建三峽工程這個事實。從撇開全國政協、擅自決定上馬三峽工程，到將三峽論證情況，向全國政協通報，並就決策問題進行協商，顯示全國政協在參與政治決策權力鬥爭中，取得了一個勝利。

接著，中共國務院接受政協委員和**代表的意見，於一九八六年五月，取消「不三不四」的「三峽省籌備組」。全國政協在《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五十年》一書中，將全國政協參與三峽工程論證、爭奪參與政治決策權力的事，作為政協五十年歷史中的一件大事，予以記載。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以中發（一九八六）十五號文下達「關於長江三峽工程論證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指出：「三十多年來，我國的有關部門和科學技術人員，對三峽工程做了大量的勘測、科研、設計工作，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國務院也曾多次組織專家並原則批准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但是，這一工程還有一些問題和新的建議需要從經濟上、技術上深入研究，以求更加細緻、精確和穩妥。」並決定由水利電力部，負責廣泛組織各方專家，進一步論證修改原來的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

同時注意吸收持不同觀點的專家參加，發揚技術**，充份展開討論，得出有科學根據的結論意見，分階段、分專題向中央書記處、國務院和全國**常委會彙報，並及時向政協通報情況。在廣泛徵求意見、深入研究論證的基礎上，重新提出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通知決定，成立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由水利電力部提出的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提請中央和國務院批准，最後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

主導論證

為加強此一工作的領導，中央指定李鵬、薄一波、王任重、程子華負責協調三峽工程論證工作。從此，三峽工程論證工作便進入更廣泛、更深入、更全面、更周密、更穩妥的新階段。六月十九日，水電部成立三峽

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組長錢正英（水電部部長）、副組長陸佑楣（水電部副部長）、副組長兼技術總負責人潘家錚（水電部總工），成員楊振懷（水電部副部長）、張鳳祥（水電部副部長）、史大楨（水電部總工）、婁溥禮（水電部總工），成員兼秘書長陳庚儀（中國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籌建處主任）、成員兼副秘書長黃友若（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後任水電部副部長）、成員魏庭琿（水電部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共十人。後來領導小組根據工作需要又替換、增補，由蘇哲文（水電部總工）替換張鳳祥；增補沈根才（水電部副總工）和徐乾清（水電部副總工），最後共計十二人。

aaa181715 2011-6-15 11:04

從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的人員組成來看，就會發現，全是清一色水利電力部的官員和工程師，不可能形成一個科學的、客觀的、中立的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

李銳在《群言》雜誌一九八八年第十期發表一篇〈三峽工程論證有感〉的文章，指出：「現在三峽工程論證由一貫急於上馬的原水電部領導，在領導這個論證領導小組的正副組長和全部人員，又都是原水電部的正副部長、正副總工程師和三峽工程的負責人，下設各專業組組長也大都為該部成員。這種局面自易於貫徹長官意志，易於形成一家之言。」此言擊中要害。

許多人以為，中共中央、國務院一九八六年決定進行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最重要任務為解決三峽工程在工程、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諸方

面，究竟可行、還是不可行的問題。強調在十五號檔中的「重新提出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這一描述。其實，這根本不是此次可行性論證的主要任務，此次論證的最主要任務是：對三峽工程蓄水位的進一步論證，而三峽工程的上馬，是早就決策了的事，完全是決策在先，論證在後。

請看李鵬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小組召開的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針對有些方面對蓄水位的不同意見，所以要組織對三峽工程正常蓄水位的進一步論證。」

作為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小組組長的李鵬，已經把一九八六年開始進行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任務，定義的十分明確，主要是解決正常蓄水位的問題，而不是回答要不要建設三峽工程的問題、以及建設三峽工程在工程、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方面是否可行的問題。

一九八六年五月五日，李鵬和錢正英、李伯甯等商議確定，由水電部主持對長辦（編註：長江流域辦公室）提出的可行性補充報告，進行初步論證，邀請各方專家參加，並由水電部及時向**、政協、中顧委，通報論證情況。可見，一九八六年開始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不是新的論證，而是長辦提出的可行性補充報告基礎上的一個繼續和完善而已。上三峽工程，已經是決定了的事。方案比較，是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中一個最重要的內容。一九八六年開始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一共進行了六個方案的比較，它們是：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五十米，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六十米，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米，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八十米，

一級開發分期建設，兩級開發。無論哪個方案勝出，都是建設三峽工程。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峽工程的可行性論證工作剛開始，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領導小組就召開第四次擴大會議，做出決定：三峽工程實現「一次開發，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移民」，具體目標是：壩頂高程一百八十五米，最終正常蓄水位一百七十五米。

這不是「決策在先，論證在後」，又是什麼？也許有人會說，最終確定的正常蓄水位一百七十五米方案，不在前面所說的六個方案之中。其實，中國政府在批准三峽工程時，有意遺忘了一個重要技術資料，那就是最高蓄水位。一九九八年長江洪水時，三峽總公司總經理陸佑楣說，三峽水庫可以蓄水到海拔一百八十點四米。二〇〇六年三峽大壩封頂時，三峽總公司副總經理曹廣晶說，三峽水庫的最高蓄水位是海拔一百八十點四米。這就可以看出，論證的結果是一百八十米方案勝出，而一百八十米方案，恰恰就是李鵬一九八四年給中央報告中，所提出的。

aaa181715 2011-6-15 11:14

欲擒先縱 虛晃一槍

從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一些具體內容來分析，也可以看出，是典型的決策在先，論證在後的範例。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所起的作用，只是給政治家已經做出的決策作注釋找依據。以下舉兩個實例。

第一是三峽工程兩線五級船閘的單向通過能力。一九八六年開始、一九八九年結束、一九九一年審查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通過三個單位、

三個模型計算，最後所得到的結論是：三峽工程的船閘單向通過能力為每年五千萬噸。其實早在一九八一年七月，長江流域辦公室副主任魏庭琤在向**彙報三峽工程時就說，三峽工程船閘的單向通過能力為每年五千萬噸。一九八一年魏廷錚尚不知道有三峽水庫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的計畫，更不知道三峽船閘的設計是兩線五級船閘，但是當年便已經把通航能力的指標定在單向通過能力每年五千萬噸。而一九八六年開始的論證，只是要拿出所謂的科學論據，說明這單向通過能力每年五千萬噸是可以實現的。但三峽船閘投入運行之後的實踐證明，三峽兩線五級船閘的單向通過能力，根本不可能達到五千萬噸。

第二是三峽水庫的防洪庫容。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說，三峽水庫的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防洪限制水位為海拔一百四十五米，處於這兩個水位之間的三峽水庫防洪庫容為二百二十一億立方米。而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李鵬在考察完三峽和重慶之後，向中共中央寫的彙報中，便已有三峽水庫的防洪庫容為二百二十億立方米的結論，而李鵬向中央建議的三峽水庫正常蓄水位為海拔一百八十米，比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所建議的要高出整整五米，而且李鵬也沒有定義防洪限制水位的高度。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八十米的防洪庫容，怎麼能和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七十五米的防洪庫容量正好一樣呢？如果說這是一個巧合，且看以下發展。

三峽工程論證結束後，清華大學教授張光斗，給中共國務院三峽建設委員會寫信，說經過清華大學水利系師生的計算，防洪庫容為二百二十一

點五億立方米是計算錯誤的結果，這個錢正英也知道，也經過長江水利委員會證實。這個錯誤計算的結果，怎麼和李鵬向中央建議的數字正好一樣？

所謂的專家論證，實際只不過是欲擒先縱，虛晃一槍。《老子三十六章》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欲擒先縱最有名的案例是三國時期諸葛亮征服南蠻，七擒孟獲。攻擊敵人過於猛烈，將遭到敵人強烈的反撲。若有意放敵人一條生路，讓其有機會逃跑，反而會削弱敵人的氣勢。緊緊地追蹤敵人，消耗敵人的軍力，利用有利時機再進行擒拿，如此，不需付出巨大代價，便得以取得勝利。

一九八五年，全國政協大會上，對三峽工程是一片反對聲浪，國內、國際也是如此，使得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不得不從原來的立場後退半步。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進行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同時也邀請了幾位反對派參加。反對派以為科學的春天到了，以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要對三峽工程進行全面的科學論證，因而看到了一線希望；但是很快就發現，他們根本就是受騙上當。

正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十五號檔所規定，這個可行性論證，只是在原來決定建設三峽工程的基礎上，進行補充論證，比如把**定下的正常蓄水位，從海拔一百五十米，修正到海拔一百七十五米、或者一百八十米的水準等等。

6 擒賊擒王：李銳出書，黨紀處分

「擒賊擒王」，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十八計。原文：「摧其堅，奪其魁，以解其體，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革命、反革命？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由水電部具體負責組織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研究，參加三峽工程論證的人選，就由水電部部長錢正英親自決定，其中最關鍵的四個人是：李銳和林一山；黃萬里和張光斗。李銳和黃萬里反對三峽工程，而林一山和張光斗則支持三峽工程。此處先介紹李銳和林一山在三峽問題上的爭論。

一九五二年，毛澤東在聽取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彙報之後，對於以三峽工程控制長江洪水，十分感興趣。之後，林一山在《中國水利》一九五六年第五、六期，發表長文，提出只有修建三峽水庫，才能解決長江洪水問題。林一山提出三峽水庫的蓄水位為海拔二百三十五米，從而形成一千億立方米以上的防洪庫容，這樣才可以把一九五四年長江防洪時，堤防擋不住的那一千億立方米的洪水，全部裝起來。

當時擔任水電局局長的李銳在《水力發電》一九五六年第九期，也發表長文，提出反對意見，認為「畢其功於一役」、試圖用大型幹流水庫解決長江防洪問題的指導思想是錯誤的。長江防洪要採取綜合措施，如：

加強堤防建設、保護湖泊和河漫灘的防洪功能，繼續建設蓄洪區，修建水庫必須從支流開始等等。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舉行南寧會議，討論三峽工程問題，毛澤東讓林一山和李銳都到會，介紹各自觀點，這是兩人第一次正式交鋒，也是長達五十多年三峽工程爭論中，唯一一次在中央決策層前的正面論辯。通過此次舌戰，毛澤東看中李銳的才能，任命李銳擔任其工業秘書。李銳可謂是英年得志。但好景不常。

一九五九年，李銳在廬山會議上，因贊同彭德懷的觀點而受牽連，被打成反黨集團首腦，而反對毛主席要搞的三峽工程，也成為李銳的罪名之一。水電部門反對三峽工程的中共黨員，差不多都被打成李銳反黨集團的成員，其中包括八個省的水電規劃設計院院長。同樣，在長江水利委員會工作，反對三峽工程的中共黨員，亦同樣被打成反黨集團，而反對蘇聯專家、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水利工程技術人員專家，則被劃為右派。

對三峽工程的態度，在當時已經成了判別革命和反革命、左派和右派的重要標準。

aaa181715 2011-6-15 11:17

長江王」林一山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毛澤東批准葛洲壩大壩工程建設。當時認為，建葛洲壩大壩工程之後，便不再提三峽大壩，因而也就放棄一九五八年所制定，重慶和三峽庫區基本建設海拔二百米的控制線。一九七一年之後，

重慶和三峽庫區便在自然洪水位之上、海拔二百米高程之下，發展城鎮建設。

林一山，對葛洲壩大壩工程建設持反對態度，因按林一山計畫，葛洲壩大壩只是三峽大壩的調節壩，要建也只能在三峽大壩完工之後再建。在毛澤東「邊設計邊施工邊修改」的最高指示指揮下，葛洲壩大壩工程沒有工程設計即開工，開工後不久便陷入一片混亂，使周恩來不得不宣佈暫時停工，也不得不請出林一山，領導葛洲壩大壩工程建設。然而也就是在林一山的領導下，葛洲壩大壩工程，成了建設三峽大壩的練兵場。但林一山已無法阻擋重慶和三峽庫區，在海拔二百米以下地區發展基本建設。

通過葛洲壩大壩工程的建設，林一山重新登上「長江王」的地位。

反對派領頭李銳

文化大革命後，李銳重新出山，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協同部長胡耀邦平反文化大革命、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冤、假、錯案，功不可沒。李銳對於水利部和長江水利委員會，向中央建議修建三峽大壩工程之事，一直十分關心，多次向中央提出書面意見。在**發表「我贊成搞低壩方案。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的講話之後，李銳也曾表示支持一百五十米方案。對此，李銳向戴晴說：「如果說我過去曾同意過一五〇低壩方案，那也是因為聽說這一方案當時黨中央常委已經通過，難以再提意見；此外這個方案需要兩級開發，勢必要補充勘測研究

並引起新的爭論，延緩開工時日。所以我當時對人說過，我的同意是緩兵之計。」

一九八五年，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李銳的《論三峽工程》一書。這是三峽工程反對派第一次公開出書，對三峽工程提出疑問。此書引出最主要的論點：決策的**化與科學化問題。

「像三峽這樣關係國計民生的巨型工程，不是哪個部門或地區的事，是全國人民的事；不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事，而是關係子孫萬代的事。這樣的大事本來是應該集思廣益的，可是過去年代，主觀自是，專斷成風，巧言偏信，好大喜功，怎麼能夠談得上決策**化和科學化呢？」李銳將自己對三峽工程的意見編輯成書，通過著作的公開出版和發行，把有關三峽工程的真實資訊與自己的觀點告知大眾，表示決策**化和科學化，為一條必經之路。

身為中央組織部副部、後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的李銳，為何不在北京尋覓出版社，發表《論三峽工程》？理由簡單，北京的出版社不敢公開出版反對三峽工程的論著，這和後來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戴晴編輯的《長江，長江》一書的情況是相同的。

aaa181715 2011-6-15 11:19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負責《論三峽工程》一書的編輯劉皓宇，後來回憶道：「此書出版以後，在社會上的反響很大，許多讀者紛紛來信求購此書，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全國的報章卻不讓發表有關此書的評介文

章。」「《論三峽工程》像一塊巨石，一石擊起了千重浪。縱使權威禁止在報刊上發表反對上馬的意見。」註：參見劉皓宇〈《論三峽工程》出版的前前後後〉。

即便李銳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就是三峽工程反對派的領頭人，但中共水電部部長錢正英竟決定，不邀請李銳參加三峽工程論證，理由是，她也未邀請林一山參加。

這個理由根本不成立。林一山當時雙目幾乎全部失明，已不主持長江水利委員會的工作。但是他的**人魏庭琤、以及長江水利委員會的多個工程師，如洪慶餘等等，皆被邀請參加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並擔任專業組負責人。這些人都代表著林一山的觀點。而不讓李銳參加論證的理由則十分清楚：

第一，一九五八年，長江王林一山權大威重，李銳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官員，而一九八六年，李銳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在平反冤、假、錯案中威信大增，憑其地位，對其他參與者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再說，李銳黨內職位在錢正英之上，如果李銳參與論證，錢正英便無法說了算。

第二，李銳反對三峽工程的理由充份，而且經常不是就三峽工程論三峽工程，而是在更高的層面分析問題，往往是一針見血。李銳對此回憶：

「水電部當然也沒有請我參加，據水利部的人說，理由是林一山不參加論證，所以李銳也可以不參加。這個理由是十分牽強的，目的是把我從論證組中排除出去。當時水電部負責人是堅決貫徹林一山的意見的，所

以林一山參不參加就無所謂了，林一山的意見就是水電部的意見。他們知道，我向中央寫過很多關於三峽工程的意見書，堅決不同意這一工程上馬，所以不希望我的看法影響論證組的其他人。」

註：參見李銳對〈歷史負責到底：回憶三峽工程上馬過程的始末〉，《當代中國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總第六十六期。

aaa181715 2011-6-15 11:21

黨紀處分

李銳因出版《論三峽工程》受到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點名批評李銳，擅自出版批評三峽工程書籍，不服從黨的紀律，因為中央書記處曾規定不准公開爭論三峽工程的問題。胡耀邦還曾親自批示，禁止李銳關於三峽工程的文章，在北京的一家最重要報紙上發表。其實當時胡耀邦根本沒有讀過李銳的這本書。

不久，胡耀邦因反對資本主義自由化不力而下臺。其後門庭冷落，一九八八年，李銳將受到批評的《論三峽工程》一書贈送解職在家的胡耀邦。胡耀邦讀完該書後，以一首詩回贈李銳。

戲題李銳同志不贊同修三峽水庫論著

妾本禹王女，含怨侍楚王。淚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長。愁應隨波去，淚須飄遠洋。乞君莫作斷流想，流斷永使妾哀傷。

胡耀邦的這首詩寫得有感情，與他之前在會議上批評李銳不服從紀律、不准李銳發表反對三峽工程的文章相比，完全不同。也許，胡耀邦這時，有充足的時間細讀李銳的文章，得以從另一角度認識三峽工程。詩中，胡耀邦對李銳的意見不能被聽取，表示同情，也或許是對自己過去的做法，表示歉意。

之後，李銳將此詩略做修改後，發表在《新觀察》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紀念英年去世的胡耀邦：

妾本巫王女，含怨侍楚王。淚滴三春雨，愁染六月霜。淚愁應隨東逝水，乘風直下太平洋。乞君莫作斷流計，天地靈藥八千方。石壁立，平湖望，流斷永使妾哀傷。

aaa181715 2011-6-15 11:22

從胡耀邦的詩可以看出，下臺後的他對三峽工程有了自己的看法。同樣，趙紫陽在下臺之後對三峽工程也表示，三峽工程對各方面都有深遠的影響，要作決策應該留給下一代，他當時所作的一切的目的，是推遲三峽工程決策的時間。

那麼，到底是誰在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面前，告狀李銳破壞黨的紀律、私下出版《論三峽工程》一書？至今還沒有人出來，為此事負責。

李鵬在其《三峽日記》一書中記載：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四日：朱鎔基對我說：『李銳給他打電話，要求中

央停建三峽工程。他已報告江澤民同志，並對李銳做了工作，勸他不要搞串聯。』』「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昨晚，江澤民同志在電話裏向我談了幾點，李銳上書要求停建三峽工程已被制止，要他從大局出發。」讀者可以從這些資訊中作出判斷。

全國**批准三峽工程後，李銳即給中共中央領導人寫信：「三峽工程木已成舟。我只建議，要接受三門峽教訓，要準備後事，即水庫形成之後，將出現哪些嚴重問題，怎樣防範？」兵法云：摧其堅，奪其魁，以解其體。龍戰於野，其道窮也。意思是：欲摧毀敵人中堅力量，就得抓獲敵人的首領，可使敵軍解體。無首的群龍在曠野拼鬥，已經進入窮途末路處境。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與反對三峽工程之重要學者李銳是好朋友，又是同鄉，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後，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李銳為其副手，兩人在平反冤、假、錯案中互相理解支持。而打擊三峽反對派的頭頭一李銳，以黨的紀律約束，不讓其發出聲音，影響中國民眾，此為三峽主上派的策略，擒賊擒王。那麼讓李銳的好朋友胡耀邦，親自出面批評李銳，將可取得最好效果，無論是從中國共產黨鐵的紀律來說，還是看在好朋友胡耀邦的面子上，李銳都不得不在批評三峽工程上，有所收斂與顧慮。

aaa181715 2011-6-15 11:24

7 笑裏藏刀：部長認親，欲阻參與

「笑裏藏刀」，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十計。原文為：「信而安之，陰而圖之；備而後動，勿使有變。剛中柔外也。」

笑裏藏刀 口蜜腹劍

唐朝有兩位笑裏藏刀的奸臣，一個叫李林輔，一個叫李義府。李林輔表明上接人待物溫良恭儉讓，但是內心兇狠毒辣，口蜜腹劍。李義府外貌看來也很溫和，與別人說話時總是面帶微笑，實際上氣量很小，猜忌心重，陰險狠毒。李義府作為一個掌握大權的人，總希望別人服從自己，對於有不同意見的人，就要加以陷害。所以當時的人們都說他笑中有刀。

「義府貌狀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作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中共水電部部長錢正英，對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可謂是口蜜腹劍，笑裏藏刀，表面上以親戚、同族關係套近乎，在鄭州會議上也多予照顧，但是在背地裏卻阻止黃萬里參加三峽工程論證。

張光斗與黃萬里

一九八六年水電部部長錢正英出任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領導小組組長，她貌似公正，既沒有邀請林一山參加，也沒有邀請李銳參加。但是在另一對人選張光斗和黃萬里身上，她就不搞什麼所謂的一碗水端平了。張光斗和黃萬里，同為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兩人早年皆留學美國，張光斗獲碩士學位歸國，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任職；黃萬里獲博士學位，

回國後在基層水利部門工作。張光斗和黃萬里，在黃河三門峽工程上曾發生意見分歧，後來黃萬里被打成右派，而張光斗則平步青雲。

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運行的實踐證明，張光斗的觀點是錯誤的，黃萬里的觀點正確。但錢正英卻邀請張光斗作為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最重要的顧問，後又出任長江三峽工程初步設計審查總負責人，以及國務院三峽工程品質檢查小組組長之一；但卻將黃萬里排斥在外。錢正英不敢邀請黃萬里參加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原因是黃萬里學術造詣高，錢正英自知與張光斗一塊，根本不是黃萬里的對手。黃萬里秉性耿直，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敢於講真話的人。雖然張光斗被稱為中國水利界泰斗，又是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但是他卻不敢在學術上同黃萬里進行面對面辯論。

套近乎

一九八八年，黃萬里在鄭州的一次學術會議上碰到了錢正英。錢正英對黃萬里是笑容滿面，熱情招待。錢正英向黃萬里套近乎，她告訴黃萬里，她的愛人——教育部副部長黃親白，是黃萬里的親戚，她自然也和黃萬里是一家人了。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黃萬里給錢正英的一封信中記載道：

「鄭州開會期間，多承招拂，無任感荷！又承告知，親白先生為我同族，返系後經查家譜，載有：元一公生五子，長留句容，次徙湖廣，三遷淮安，四由故蘇徙吳江路去崇明西沙黃家村，五隨兄而東居嘉定清溪鎮，

傳十一世至細一公。按元一公為宋徽宗侍衛，北宋亡後南渡，名黃彥。元一公是春申召黃歇的四十一世孫。元一公傳十九世為雪谷公，定居川沙高橋。（高家行）元一公傳廿八世為我一代，多以鐘字排行。今家譜稱雪谷公家譜，雪谷以下有氏族詳載。未見親白先生是否出自嘉定一支？有便當趨緜。若屬同族，則當以宗嫂相稱矣。」

後來，錢正英還親自和黃親白一起在中國新年期間，至黃萬里家拜訪，並以名利誘之，遊說黃萬里不要對長江三峽工程發表意見。可是黃萬里並不領這「同族、親戚」的情，而是在信中直接了當地指出錢正英在水利工作上的嚴重錯誤：

- 捨棄淺層地下水，卻鼓勵開發深層地下水；
- 沒有從黃河三門峽工程失敗中吸取教訓；
- 一九六三年海河大洪水時政府制定的行洪措施錯誤，導致重大災害；
- 水電開發工程中錯誤；
- 沒有對葛洲壩工程建設失誤進行總結；
- 一九七五年板橋等數十座水庫潰壩造成損失超過歷史上黃河淹開封、漢江決堤淹城的損失；
- 南水北調東線方案的錯誤；
- 對中國水資源的錯誤評價，導致國家水利政策的錯誤；
- 制定水法中的錯誤。

黃萬里指出，錢正英（後被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在水利方面是外行，是外行的行政領導，硬要充當內行領導技術，這是自找苦吃註。這擊中錢正英要害，因為錢正英在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中是專家，在專家中是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幹部。

黃萬里沒有聽這位宗嫂的勸阻，而是積極地投身到三峽工程的評價之中。黃萬里在沒有一元錢科研經費的情況下，撰寫了多篇關於三峽工程的重要科學論文，它們是：

- 《論長江三峽大壩建設的前提》
- 《怎樣決定三峽大壩是否修建？》
- 《長江三峽高壩永不可修的原由簡釋》
- 《關於長江三峽礫石輸移量的討論》
- 《關於長江三峽礫石輸移量的討論（續）》
- 《籲請長江三峽大壩即日停工！此壩決不可修！》
- 《關於長江三峽修建高壩可行性問題》

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楊鐵笙說：「一個國家做一項重大工程決策，投入上千億元的超級工程，涉及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環境保護等等，應該採取什麼方法來論證是十分重要的。從黃先生的情況來看，他有截然相反的見解，為什麼不可以給點科研經費，給點必要的條件，讓他深入進入研究呢？哪怕這個研究結論可能是錯的，為了把事情考慮得更周密，為了留有適當的餘地和空間，也並非完全多此一舉。」

黃萬里三次上書

一九九二年以後，黃萬里三次給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寫信，陳述三峽工程永不可建的道理：

第一，在長江上游，影響河床演變的造床質是礫卵石，不是泥沙，修壩後將一顆也排不出去，十年內就可堵塞重慶港，並向上游延伸，汛期淹沒江津、合川一帶。現報告假定礫卵石不動，以泥沙作模型試驗，是錯誤的。

第二，中國水資源豐富，時空分佈也合適。中國所缺的是供水足夠地區的耕地。水庫完成後淹地五十萬畝，將來更多，用來換取電力，實不可取。

第三，三峽大壩經濟可行性是根本不成立的。它比山區大中型電站每千瓦投資要貴兩三倍。報告中的經濟核算方法是錯誤的。

第四，三峽水庫對長江中下游防洪雖然有些幫助，但效果不大。蓄清排渾的代價是使排洪工程加大，守堤防汛期加長，而所利用的電能大減。長江防洪迫在眉睫，應該浚治。

黃萬里要求中央領導給他三十分鐘的時間，講解其中的道理；但黃萬里直到去世，也沒有得到江澤民和中央領導的回應。

一九五七年在黃河三門峽工程爭論上，黃萬里還有七天的時間，可以公開發表意見，舌戰群儒，然到了三峽工程爭論上，他連三十分鐘的機會也沒有。

一九九四年底，三峽工程正式開工。一九九五年黃萬里悲痛寫下「哭長江三峽大壩開工」詩一首：

生在江頭吞海口，心憂三峽壩工久。
東來雲氣滿巴蜀，西仰江流灌畦畝。
衍溢淫浸焊生物，含泥潤溽灘塗厚。
江南江北倉廩實，溪溝遍通九州阜。
巨舸遠洋直駛漢，千噸汽艇萬渝走。
湘資沅澧雲貴川，坡陡能豐足稱首。
縱遇漏天蛟龍虐，長堤千里差堪負。
環球巨浸一何多，獨此優遊世罕有。
三峽谷深流亦豐，招來造壩建奇功。
攔洪發電兼添航，詔謂人間第一工。
孰料此江床滿石，火成鵝卵逐流中。
巫山著意催雲雨，江水亡情沙石沖。
庫尾沉淪渝港塞，延伸溢岸泛濤洪。
楚王愁看移民苦，遷鯁爭功脅眾從。
樗散衰儒不曉機，再三抗疏議陳窮。
但聞猛虎千家哭，悵望輪台悔詔空。

8 遠交近攻：加國論證，意壓國人

「遠交近攻」，為三十六計之第二十三計。原文：「混戰之局，縱橫捭闔之中，各自取利。遠不可攻，而可以利相結；近者交之，反使變生肘腋。范雎之謀，為地理之定則，其理甚明。」

中加交易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和一九八五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電力部和加拿大政府國際開發署，先後簽訂兩份諒解備忘錄，內容是關於中加兩國政府在中國的水電工程合作，其中包括長江三峽工程和黃河小浪底工程。一九八六年三月，水利電力部向加拿大國際開發署表示，願意聘請一家諮詢公司，編寫一份獨立的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加拿大政府願意提供贈款，支援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但條件是：此可行性研究必須由加拿大諮詢公司單獨進行。

對於這場交易，中共的目的是：

- 用國外公司可行性研究報告的結論，來封住國內反對派的嘴；
- 為中國政府、領導人的決策提供所謂的科學依據；
- 為中國專家撰寫可行性論證報告提供一個範本；
- 為國際上籌集資金、特別是獲得優惠貸款提供必要的文件。

加拿大方面的目的則是：

- 和中國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
- 進入中國水電市場，並獲得優越位置；
- 幫助加拿大公司優先拿到三峽工程建設中，主要專案和提供發電機組等設備的合同。

一九八六年五月經中共國務院批准，經貿部代表中國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簽訂協定，由加拿大政府國際開發署提供贈款一千四百萬加元，由加拿大國際專案管理集團長江聯營公司，負責編製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這個長江聯營公司由 LAVALIN, SNC 和 ACRES 三家諮詢公司以及魁北克省水電局，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水電局聯合組成的。為了配合加拿大諮詢公司的研究，水利電力部和長江水利委員會，派出強大的隊伍參與這項工作，中方參加人員超過了加拿大方面的人員。加拿大國際開發署副總裁在合同簽署之後表示：中國三峽工程可望為加拿大帶來數億加元的生意合同。

一九八六年七月，這項由加拿大國際專案管理集團長江聯營公司，所負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峽水利樞紐可行性研究，正式開始。至一九八八年六月，工程可行性研究結束。經過所謂的專案指導委員會、國際專家組的審查，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全部完成。

加國報告幾與中方無異

加拿大國際專案管理集團長江聯營公司推薦方案的主要資料為：

壩頂高程：海拔一百八十五米

水庫正常蓄水位：海拔一百六十米

水庫限制洪水位：海拔一百四十米

發電航運消落限制水位：海拔一百四十米

最高防洪運行水位：海拔一百八十一米

最高防洪運行水位時流量：八萬立方米 / 秒

核准洪水（可能最大洪水）水位：海拔一百八十三米

核准洪水（可能最大洪水）流量：十一萬六千立方米 / 秒

總庫容（在海拔一百八十三米時）：四百八十一億立方米

防洪庫容（在海拔一百四十米至一百八十一米之間）：三百一十億立方米

多年平均流量：一萬四千三百立方米 / 秒

枯水期調節流量：五千一百二十立方米 / 秒

總裝機容量：一千六百七十五萬千瓦

長期多年平均電能：七百六十二億千瓦小時

庫區改善航道：五百一六公里

淹沒耕地：三十萬畝（二萬公頃）

移民人口：七十二點七萬

永久通航船閘：雙向五級連續階梯式船閘，每級提升二十米工程總費用（一九八七年年中價）：二百四十六億元人民幣

加拿大國際項目管理集團長江聯營公司可行性報告的結論，和中國方面

幾乎沒有什麼差別：三峽工程效益巨大，技術、經濟上可行，在環境影響方面也是可行的，建議早日興建。註：參見楊溢〈三峽工程論證〉，《水利年鑒一九九〇年》，第四四一至四五三頁。

不同之處在於，雖然壩頂高程也是海拔一百八十五米，但是水庫正常蓄水位為海拔一百六十米，比中國的海拔一百七十五米，低了十五米。但是加拿大方面公佈最高防洪運行水位為海拔一百八十一米，甚至可以達到海拔一百八十三米，但這些資料在中國的可行性研究報告中，卻沒有公佈。另外，加拿大方面認為沒有必要建設升船機。加拿大本身沒有升船機，可能是認為技術上不可行，實際效果也不會好。

aaa181715 2011-6-15 11:36

世界銀行在為該可行性報告的評價中寫道：考慮移民的艱巨性和經濟合理性，世界銀行不支持比海拔一百六十米更高的水庫正常蓄水位。世界銀行的態度是建立在加拿大可行性報告中，所提出的移民總人數七十二點七萬，此移民人數是世界銀行認為可以接受的最高上限。而實際情況又是如何？中國的政治家不是喜歡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麼就讓事實來說話吧！

二〇〇六年，三峽水庫蓄水至海拔一百五十六米，距離加拿大方面推薦的海拔一百六十米還差四米，為達到這個蓄水位，已經搬遷了一百二十三萬移民！加拿大方面計算的三峽工程造價為二百四十六億元人民幣（一九八七年年中價），而實際上三峽工程造價，超出二千億元人民幣。

加拿大國際專案管理集團長江聯營公司的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的實質是，加拿大公司為了優先拿到三峽工程建設中主要專案和提供發電機組等設備的合同，全盤接受水利部和長江水利委員會提供的資料和建議，將中國方面希望得到的結論，用西方國家普遍採用的撰寫形式，加以包裝。

國際仲裁

在加拿大多倫多的國際探查組織（Probe. International）組織了世界上九名學者，包括水利、地理、經濟、能源等方面的專家、對加拿大國際項目管理集團長江聯營公司所作的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進行再評估。學者指出，加拿大電力工程財團，為了從龐大的三峽工程中得到豐厚的利益，不惜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做出一個不負責任的、並且充滿誤導性結論的可行性報告。

更甚者，中國政府將根據這份錯誤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做出錯誤的決策。一位專家對此份報告的評價是：這哪裏是科學和工程學？純粹是利用加拿大納稅人的錢去強姦民意。國際探查組織和其他一些民間團體，將加拿大政府支持，由長江聯營公司提出的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告到了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第二國際水利仲裁局」。

一九九一年，阿姆斯特丹「第二國際水利仲裁局」裁定：加拿大政府和工程財團在建議三峽工程上馬事宜中，密謀行事。指出由加拿大政府資助、加拿大工程財團為中國政府撰寫的可行性報告，是出於私利，對於

三峽工程的生態、社會、經濟風險估計不足，一心只希望從三峽工程中，獲得高達數億加元的合同，從而慫恿三峽工程早日動工。「第二國際水利仲裁局」不僅譴責加拿大政府資助這項喪失信用的可行性研究，也指責中國政府全然接受這份滿是疑點的可行性報告。註：陳中玉〈三峽工程激辯未了——加國可行性報告受國際抨擊〉，《爭鳴》一九九三年三月號，第五十九至六十頁。

由於「第二國際水利仲裁局」的裁定，加拿大國際專案管理集團不能繼續參與三峽工程。但是中國三峽工程的決策者，是不會忘記加拿大長江聯營公司對三峽工程上馬的支持。雖然加拿大公司不能直接在三峽工程上獲得專案，但中國還有許多其他的水利工程，如黃河小浪底大壩工程、清江水布壩大壩工程等等，組成加拿大國際項目管理集團長江聯營公司的加拿大公司，在這些工程上，都拿到了許多項目，作為報償。

遠交近攻

古文云：「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意思是，大王不如交好距離遠的國家進攻鄰近的國家，這樣，得了一寸土地就是大王的一寸土地，得了一尺土地就是大王的一尺土地。

中共利用加拿大長江聯營公司可行性研究報告的結論，來封住國內反對派的嘴，正為遠交近攻計謀的現代應用。

aaa181715 2011-6-15 11:39

9 借刀殺人：取經埃及，打擊對手

「借刀殺人」，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三計。原文：「敵已明，友未定。引友殺敵，不自出力，以《損》推演。」

李鵬率團參觀埃及大壩

埃及阿斯旺大壩工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壩工程，西方國家的地理課程中，對阿斯旺大壩工程皆持批評態度，並論述此工程所造成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問題。

在三峽工程論證的一次會議上，潘家錚(註：潘家錚，是三峽大壩建設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並擔任中國長江三峽工)向參加三峽工程論證的專家們，介紹自己和水電部副部長史大楨、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魏庭瑋，陪同李鵬參觀考察埃及阿斯旺大壩工程的經驗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十日，李鵬率中國代表團訪問非洲四國，在十月八日參觀了阿斯旺大壩工程。(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十日，李鵬率中國代表團訪問非洲四國，在十月八日參觀了阿斯旺大壩工程。)程開發總公司技術委員會主任。曾任中國水利電力部總工程師，能源部水電總工程師。

潘家錚向會議報告：「盧特非總理所下結論是：高壩工程是完全成功的、穩妥的、利大於弊的。代表了埃方正式見解，這和一些外國組織或專家（主要是搞技術的）所得的結論也是相似的。」「我國目前正在進行三峽工程的論證工作，各方面在許多問題上存在分歧意見，有些意見受到阿

斯旺高壩工程得失的影響。例如泥沙淤積、下游沖刷、河口影響、生態環境、移民和古蹟淹沒、工程效益及國力問題等等，通過這次考察，瞭解埃及的經驗和教訓，對我國三峽工程有借鑑意義。」

李鵬在《眾志繪宏圖》一書中，記載了他對阿斯旺大壩工程的評價（第一百～一百〇二頁）：這是一個造福於埃及人民的偉大水利工程。時間越久，它的作用將表現得越充分。它的主要作用：

「一、發電。共十二台機組，每台十七點五萬千瓦，總裝機二百一十萬千瓦，年平均發電八十五億千瓦時。

二、防洪。阿斯旺水庫多年調節庫容一萬五千億立方米，相當於尼羅河歷史上出現的最大年徑流總量。所以阿斯旺的溢洪道從來沒有打開過。而過去尼羅河三角洲每年被洪水淹沒一次，這種情況已告結束。

三、供水。向工業、農業、城市提供可靠的水源。開羅缺水，一年降雨量不到一百毫米。開羅的繁榮，甚至埃及幾千年文明史，都離不開尼羅河，否則這裏會是一片沙漠。

四、灌溉。阿斯旺水庫建成後新開墾土地是原有耕地一倍，六百萬英畝。農業由每年一熟增加到二熟甚至三熟，由傳統種植方式發展到科學種田。由於河水變清，使得因泥沙淤積形成的三角洲失去了自然的肥料來源，但可以通過使用綜合化肥得到解決。這樣雖然增加了糧食單位成本，但由於產量提高，農民的收入還是增加了。

五、旅遊。阿斯旺成為一個新興的旅遊城市，有二十萬人。旅館共萬張床位。阿斯旺以下二百公里，就是聞名世界的風景勝地盧克梭神廟。

六、改善了航運條件。當然，因為可運的東西甚少，所以航運效益尚不明顯。水庫五百多公里長，從上游直達開羅，四百五十公里，都可以通航。

阿斯旺水電工程帶來的負面影響主要是一系列生態平衡問題：

一、由於下游耕地只灌不排，造成耕地的鹽鹼化。現在已經採取排水措施加以解決。

二、河床下切，原來預計一米，實際只下切六十五釐米，問題也不很嚴重。

三、海岸線後退是個問題，每年後退一百五十米，現在採取保護措施，辦法就是修築海堤。

四、對漁業的影響。漁業減產主要原因是魚塘鹽鹼化造成的，淡水上升，海水下沉，沙丁魚沉入深層。由於埃及捕撈沙丁魚技術的改造，水產業已得到恢復。現在阿斯旺水庫納賽爾湖年平均魚產量已達三點五萬噸，還準備在五年內增加一倍，因此水產損失已得到補償。

五、水庫發生過幾次小地震，埃及專家認為不屬於水庫誘發地震性質。

六、蘇聯設備品質不高，已換成英國的設備。水輪機已用二十年，有的葉片發生裂紋。已使用美方貸款購買十二台新水輪機轉子，每台五百萬美元，已換兩台，正在換兩台，到一九九〇年可全部換完。」

李鵬認為：「阿斯旺是一個成功的專案，有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但海岸後退、沙丁魚減產等等不足之處是當初設計時沒有預料的，有的正在克服之中。國際上之所以對阿斯旺工程有不好的評價，應該說是有政治上的原因，因為阿斯旺水電站是蘇聯設計和蘇聯支援建設的，所以西方對它不說好話。但是，我碰到的埃及人，對此項目都是肯定的。」

此處，李鵬指責西方國家將阿斯旺工程政治化，根本原因在於反蘇、反對社會主義聯盟。而面對世人對三峽工程的批評，中國政府也是採取同樣的態度，認為：這些人本身就是熱衷「反對中國」，是借批評三峽工程來達到「反對中國」的目的。

aaa181715 2011-6-15 11:42

美國學者評價

美國康乃爾大學生態學博士，美國佛吉尼亞理工大學助理教授牟溥，在《當代中國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三期上發表題為〈埃及阿斯旺大壩對環境的影響日益嚴重〉文章，對這個大壩工程做了中肯的評價。他在文章中指出阿斯旺大壩工程，所帶來的幾個嚴重生態環境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大壩工程造成了沿河流域可耕地的土質肥力持續下降。

尼羅河下游地區的農業，原得益於每年洪水帶來的大量肥沃泥沙，週期性的為土壤補充肥力和水份。可是，在大壩建成後，由於泥沙被阻於庫區上游，下游灌區的土地得不到營養補充，以致土地肥力不斷下降。

第二個問題是：沿尼羅河兩岸出現土壤鹽鹼化。由於河水不再氾濫，也就不再有雨季的大量河水帶走土壤中的鹽分，而不斷的灌溉又使地下水位上升，把深層土壤內的鹽分帶到地表，再加上灌溉水中的鹽分和各種化學殘留物的高含量，導致土壤鹽鹼化。

第三個問題是：庫區及水庫下游的尼羅河水水質惡化，危害以河水為生活水源的居民健康。水質惡化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庫區水的大量蒸發，另一則是，土地肥力下降迫使農民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化肥的殘留部份隨灌溉水又回流尼羅河，使河水的氮、磷含量增加，導致河水富營養化。土壤鹽鹼化也導致尼羅河水的含鹽量增加。

第四個問題是：河水性質的改變使水生植物及藻類到處蔓延，不僅蒸發掉大量河水，還堵塞河道灌渠等等。

第五個問題是：尼羅河下游的河床遭受嚴重侵蝕，尼羅河出海口處海岸線內退。大壩建成後，尼羅河下游河水的含沙量驟減，河水中泥沙量減少，導致了尼羅河下游河床受到侵蝕。大壩建成後的十二年中，從阿斯旺到開羅，河床每年平均被侵蝕掉 2 釐米。預計尼羅河道還會繼續變化，大概要再經過一個多世紀才能形成一個新的穩定的河道。河水下游泥沙含量減少，再加上地中海環流把河口沉積的泥沙沖走，導致尼羅河三角

洲的海岸線不斷後退，國土喪失。

牟溥博士指出：「在六十年代阿斯旺大壩興建時，人們對大壩的認識還是片面的。阿斯旺大壩建成後陸續出現的生態和環境問題中，有些是設計時預料到、但無法避免或無力解決的；有些則是有所預料、但對其後果的嚴重性估計不足的；還有些問題則是完全沒有預料到的。直到今天，人們仍然認為，要精確地預測大壩對生態和環境的影響還是相當困難的。由於在興建大壩前，要判斷大壩工程的後果有很大的不可預測性，所以，目前很多國家的公眾輿論和學者專家們往往對超大型水利設施的建設持反對或謹慎的態度。」

aaa181715 2011-6-15 11:44

世界趨勢

必須指出的是，在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後，工業發達國家開始放棄建設大型水庫大壩工程，放棄用大型水庫大壩工程來推動一個區域經濟發展的模式，原因在於人們開始認識到大型水庫大壩工程，對生態環境存在著不可逆轉的負面影響。

埃及阿斯旺大壩所引起的嚴重生態環境和社會問題，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但是中國的政治家和工程技術幹部，卻看不到世界發展的趨勢，把淘汰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當作現代化模式來用，把邊緣化的技術當成先進技術來加以引進，他們不承認大規模水庫大壩建設將給中國帶來嚴重的生態環境、社會問題、甚至安全問題。

當年埃及總統納賽爾在大壩合龍時，對埃及人民說：阿斯旺大壩將把埃及帶入天堂。幾十年過去了，埃及並沒有進入天堂。

一九八七年前，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一次科學大會上，對參加會議的各國科學家們說：「兄弟們，姐妹們，從現在到二〇〇〇年，埃及將不得不面臨一些重大的挑戰，你們一定要幫助我們取得勝利。這些挑戰，也就是現在和將來我們所必須要面對的嚴重問題，需要從各個角度進行嚴肅的科學研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阿斯旺大壩所造成的影響。」

一位埃及科學家曾經對阿斯旺大壩工程做出這樣的評價：納賽爾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決定建設阿斯旺大壩工程；決定拆除阿斯旺大壩的將是一個比納賽爾更偉大的政治家。

套用這位埃及科學家的話：決定拆除三峽大壩的，將是一個比毛澤東、**、江澤民更偉大的政治家。營造決策氛圍借刀殺人之意在於，用別人的力量消滅敵人，自己不必付出任何代價。中共通過新華社記者一篇關於國務院副總理李鵬，率中國代表團參觀埃及阿斯旺大壩工程的報導，便把「阿斯旺是一個造福於埃及人民的偉大水利工程，有巨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錯誤結論，傳播給國人，以圖造成有利三峽工程決策的氛圍。

這無非是，借阿斯旺大壩的刀，來打擊三峽工程反對派。

10 反間計：侯馬矛盾，取而代之

「反間計」為三十六計之第三十三計。原文：「疑中之疑。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製造矛盾 反間得利

參加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四百一十二位專家中，有十五位科學院學部委員，他們分別是：陶詩言、黃秉維、賈福海、謝義炳、侯學煜、馬世駿、侯建康、陳化癸、嚴愷、毛鶴年、陳宗基、黃文熙、張光斗、強尼、高景德。其中馬世駿出任生態環境專業組組長，侯學煜出任生態環境專業組顧問。

馬世駿和侯學煜都是中國著名的生態環境科學家，兩人在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問題的最主要結論上是一致的，即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弊大於利。然而為了避免和決策者正面衝突，馬世駿建議在結論後面補上一句：「許多弊病是可以通過人為措施加以限制的」，遭侯學煜堅決反對，兩人堅持不下，論證領導小組因而讓生態環境副組長方子雲，代表生態環境專業組，作大會彙報。

最後，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以三峽工程生態環境影響報告之提綱，未經審查批准的程式錯誤，否定侯馬二人「弊大於利」的報告，另外組成三峽工程論證生態環境二組，並以名利收買生態環境副組長方子雲，由其出任組長，通過五個月的時間，重新編寫三峽工程生態環境影

響報告，得出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是「利大於弊」的結論。

《孫子·用間篇》云：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所謂反間，便是利用敵方間諜、或者收買敵方官吏，為我所用。而方子雲，便是反間計中的「間」，是一出賣靈魂、而收名利的官吏。

生態破壞侯學煜是全國政協委員，自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七年期間，對中國二十個省市進行考察，發現所有中小型水庫，幾乎沒有一個能解決水庫移民問題。安徽金寨縣，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所修造的水庫，其移民還依然生活在貧困之中，當地移民形容水庫工程為：「十萬子弟兵，十萬畝良田，十萬人無家可歸」。水庫移民的生活不能得到改善，與水庫大壩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是分不開的。侯學煜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分析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從而提出一些新的觀點。註：參見侯學煜〈三峽工程要考慮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收集在田方等編《論三峽工程宏觀決策》，一九八七年，長沙，第二六九至二七三頁。

比如如何防洪？侯學煜認為：三峽工程只攔截來自川江的部份洪水，而對下游荊江泛區的洪水來源不起作用，所以，三峽工程對荊江窪地洪澇災害的防治，作用十分有限。治理長江中、下游的洪澇災害，應從多途徑著手，首先要恢復水面地區的植被，使暴雨變為細水長流。同時也應該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原有的天然蓄水湖泊。例如江漢湖群在五十年代有一千二百五十萬畝湖泊，由於圍湖造田，現只剩原有的百分之二十四，這些低窪田有的應退墾還湖，有的可種喜濕的經濟作物或樹木，以

提高經濟效益。此外，荊江大堤工程不可放鬆，分洪也很重要。於大壩上游，三峽工程的建設只會使下游的洪水災害，轉移到上游去。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就把水庫大壩建設，作為防洪的最主要技術手段，在全國建造了近八萬六千座水庫大壩；然而洪水的威脅和危害非但沒有減輕，反而加重了。問題就出在防洪的概念上。侯學煜提出防洪首先要恢復地面的植被，使暴雨變為細水長流，這是符合自然規律、生態環境友好型的防洪正確途徑。

aaa181715 2011-6-15 11:48

針對三峽工程建設能促進庫區柑桔發展的觀點，侯學煜提出相反的論據。三峽工程主上派把三峽工程農村移民安置，寄託在柑桔發展上，認為水庫的形成會使冬季絕對最低溫度提高，對柑桔越冬有利，並可以擴大栽種面積。

對此，侯學煜指出，三峽水庫所要淹沒的幾十萬畝土地，是沿河階地上肥料較高的沖積土，含磷量豐富，舉世無雙，土地資源損失十分嚴重。在坡度上開墾，只會加大水土流失，後果不堪設想，而且開墾的坡地土層淺薄，肥力低下。另外由於三峽大壩高一百八十米，柑桔園被迫遷移到海拔更高的地區，由於氣溫是隨著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降低，對柑桔的生長和越冬都不利。說三峽工程建設能促進庫區柑桔的發展，難以令人理解。

關於泥沙淤積問題，侯學煜首先對長江水利委員會提出的論點——長江

三峽段的泥沙量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沒有發生變化——進行了批判。侯學煜說，現在上游各支流全年含有大量泥沙的渾濁河水，與五十年代冬季碧清河水，形成鮮明對照，此為一客觀存在的事實。

因此，水庫建成之後，突然沖刷不僅影響水庫的壽命，且泥沙淤積抬高河床，對上游航運發生阻礙，乃是不可避免的。三峽工程給長江航運帶來的好處，只不過是改變大壩以上三百公里的航運，但大壩距重慶六百公里，重慶以東三百公里因回水變動的泥沙淤積，縱使水庫「放水拉沙」，也不會拉到涪陵、長壽、重慶等上游一帶的河床泥沙，因而重慶有可能成為死港，其結果必然阻礙西南經濟發展。

此外，侯學煜指出三峽工程將引起海水倒灌，太湖一帶鹽鹼化，破壞魚類資源，特別是特有魚種有可能滅種。同時，水庫建成，水流流速減小，自淨能力減弱，庫區水環境污染亦會加重。

侯學煜還進一步提出三峽地區綜合地質災害的理論，此部份將於後文再述。

註：退墾還湖，中國政府片面強調糧食生產，把湖泊、濕地開墾為農田，破壞了自然生態系統，占據了水的空間，增加了洪水災害，典型的例子便是對洞庭湖的圍墾。一九九八年長江洪水之後，中國政府提出退墾還湖，就是放棄已經圍墾的農田，恢復原有的湖泊、濕地。

aaa181715 2011-6-15 11:50

侯馬二人 意見紛歧

侯學煜為一介書生，不諳官場技巧。但馬世駿則任所長多年，在科協許多分會擔任負責人職務，通曉官場奧妙。針對生態環境專業組，關於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的初步結論是弊大於利，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在專業組長會議上，已有所了解。並且通過論證領導小組對馬世駿的工作，致使馬世駿的立場出現變化。

馬世駿知道，把「弊大於利」的結論交上去，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肯定不會接受，作為組長，也就等於沒有完成上級所交代的任務。但要得出領導所希望的「利大於弊」，參加論證的多數專家皆不會同意，與自己的良心也過不去。因而馬世駿提議，在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弊大於利的結論後面，補上一句，即：許多弊病是可以通過人為措施加以限制的。

對於結論的這後半句話，「許多弊病是可以通過人為措施加以限制」，侯學煜堅決不同意。侯學煜認為：

第一，在三峽工程論證中，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損失並非強調得太多了，而是基本上沒考慮。三峽工程論證，只是就工程論工程，很少考慮水壩可能給人民帶來的禍害和災難，更談不上考慮三峽工程對庫區，以及對整個長江流域的影響。

第二，提出的一些對策不能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所以不能說許多弊病是可以通過人為的措施加以限制。為此，侯學煜和馬世駿發生了激烈爭論，

爾後此爭論發展到不僅涉及提出的補救措施是否有效，更涉及知識分子的道德和社會責任問題。

馬世駿認為侯學煜不靈活，不能變通，馬世駿甚至認同錢理群的觀點，認為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一個人可以說假話，只要這個假話不會傷害第三者；侯學煜則堅持認為，許多對相關問題真正有研究、有見識的同志，應該參加而沒能參加，而當初參與三峽論證，便是為了表示論證中有持不同意見的人加入。

因此專事研究生態問題的侯學煜認為，既然參加了，有看法就得表達出來，得對國家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侯學煜說：

「一個人可以說錯話，但不可以說假話。我講的是真心話，對不對自有公論，也有待歷史實踐的檢驗。」

最後生態環境組上報的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問題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弊大於利，但是許多弊病是可以通過人為的措施加以限制。侯學煜不同意這個結論，因此拒絕在論證報告上簽字。

侯馬相爭 方子雲出線

馬世駿怎麼也沒有想到，即使在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問題的結論上，做了一個違心的讓步，但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領導小組，對此結論仍舊不滿意，因為他們早已在總報告中，作出了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

響是「利大於弊」的結論。而組長馬世駿和顧問侯學煜的爭吵，讓副組長方子雲得利。

在馬世駿和侯學煜僵持不下的情況下，方子雲分別於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代表生態環境組，向論證領導小組與大會作彙報。

一九九一年九月初，方子雲出任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生態環境二組組長，在原有資料的基礎上，重新編寫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報告，得出了讓論證領導小組、和國務院領導人都滿意的結果：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是「利大於弊」，此結論通過了國務院環保局的審查；此時，馬世駿和侯學煜都已去世。馬世駿於一九九一年上半年，死於一場至今尚未破案的車禍之中；侯學煜也於一九九一年上半年，死於北京解放軍總醫院。

一九九二年，方子雲出版三峽工程系列叢書中《生態環境》一書，吹噓三峽工程所謂「正面生態環境效應」，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三峽水庫的形成，可使重慶夏季最高氣溫減低攝氏四度，氣候趨於冬暖夏涼。這就是後來中國媒體所宣傳的三峽工程的空調效果；然而事實上，二〇〇三年三峽水庫形成，二〇〇六年夏，重慶出現歷史最高溫。然方子雲是於一九九二年，被中共國務院授予有特殊貢獻的專家，年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反間計中的間可以有五種，敵間(敵方派遣的間諜)、鄉間(利用敵國人為間諜)、內間(收買敵國官吏為間諜)、死間(向敵方傳遞假報的間諜)，以

及生間(到敵方偵探的間諜)。

方子雲乃反間計中的間，是為名利而被三峽工程主上派所收買的間，既在馬世駿和侯學煜主持的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影響是「弊大於利」的論證報告上簽字，又在其所主持的「利大於弊」論證結果上簽字，方子雲之人品、道德、學術水準可見一斑。

aaa181715 2011-6-15 11:53

11 趁火打劫：戴晴入獄，殃及反派

「趁火打劫」，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五計。原文：「敵之害大，就勢取利，剛決柔也。」

反對派發聲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底，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工作即將結束，論證領導小組原則通過了十四個論證小組的報告，長江水利委員會將在此基礎上撰寫工程可行性報告，計劃於一九八九年春季，上報國務院審批。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一些政協委員、學者、記者和編輯決定：趕在國務院審議決定之前，讓反對派的聲音發出去。因而以李銳、周培源、孫越崎為首，陸欽侃、侯學煜等科技人員為中堅的三峽大壩工程反對派，再加上戴晴女士引領的一大批記者，皆同認為：有必要在上報國務院審批之前，讓全國人民聽到三峽大壩工程反對派的意見。同時，在貴州人

民出版社編輯許醫農女士的幫助下，獲得了出版書籍的書號。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由戴晴主編的《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一書出版了註。其速度之快，在中國出版史上實屬罕見。《長江，長江》一書收錄了以下文章：

- 李銳答戴晴問：〈三峽工程 21 世紀再定〉；
- 周培源、林華同錢鋼談：〈「我們很關心，我們不放心〉〉；
- 孫越崎答張愛平問：〈對不同意見應平等對待允許爭論〉；
- 喬培新答李新喜問：〈三峽工程總投資概算打的埋伏太大〉；
- 彭德同方向明、李偉中談：〈斬斷了「黃金水道」還能再挖一條長江嗎？〉；
- 王興讓答陳鷹問：〈三峽工程移民和淹沒土地將是生產力的大破壞〉；
- 陸欽侃答陳可雄問：〈三峽工程防洪效益有限〉；
- 候學煜答朱劍虹問：〈三峽工程引起的生態環境破壞貽害無窮〉；
- 羅西北同吳錦才談：〈追求發電效益並非是合理的選擇〉；
- 陳明紹答剛建問：〈治理長江應先支後幹〉；
- 田方、林發棠同張勝發談：〈國際輿論反對三峽工程上馬〉；
- 楊浪：〈高壩：懸頂之劍〉；
- 千家駒：〈三峽工程緩建、資金用於教育〉；
- 茅於軾：〈水庫退役後的狀況和後果為何不見論證〉；
- 吳稼祥：〈當前的經濟和體制條件難以支撐三峽工程〉；

——姜洪：〈我們現在尚無能力開發長江資源〉；

——景軍：〈三峽工程應有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參與論證〉；

——戴晴：〈後記〉。

aaa181715 2011-6-15 11:55

政治評論家吳國光為《長江，長江》撰寫序言：

中國知識界的直言不諱的發言，終於打破了圍繞三峽工程理應展開的爭論中不應有的沉默寂靜，將一個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鮮明地提到了國人面前。在中國，一切問題無不帶著政治色彩，重大問題尤其不可能不被視為政治問題。三峽工程，是上，還是不上？顯然主要是一個科學論證問題。

可是歷史和現實並不曾讓它以這樣的單純的形式出現，而是強行納入政治軌道。「李銳反黨集體」是一個已成「歷史」的悲慘事實，它說明在一個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最高政治領導人一言九鼎的體制下，「政治泛化」的現象可以「泛」到何等程度，以致於蕩平一切良知與科學的準則。

在三峽問題幾十年來的風風雨雨中始終是一個有形無形的決定力量，完全扭曲直至扼殺一切科學探討與論爭，劃地為牢地把一個應撥動國人心弦的問題變成一個人人寧願緘其口的禁區。

現在這一聲「叫號」作為土語含有「挑戰」意，它確實是一種挑戰：讓全能的政治後退五百步！只有擺脫開全權、全能政治的羈絆，作為一種獨立人格和格致理性出現，科學才有可能開始體現自己本能而求得與自

然相契合的公平與正義。主張三峽上馬的科學家也自有其道理，科學本身會最終為這種分歧找到解決方法。問題只在於，當科學一旦成為政治的僕從時，它就不成為其科學了。……對於中國人來說，幾十年乃至幾千年的悲劇恰恰在於政治支配了科學，吞噬了科學，乃至支配和吞噬了全部社會生活，吞噬和支配了人的大腦和良心。

中國知識界在三峽問題上的發言，可以說是重大的歷史性行動，它好比是向傳統政治體制及其權威扔下一隻白手套，意味著：叫號——也就是挑戰：你對民族負責嗎？

aaa181715 2011-6-15 11:57

八九學運 趁亂打壓

人們對三峽大壩工程討論的注視，只持續了很短時間。不久，中國和世界的眼光，便集中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原計劃的三峽大壩工程可行性報告，也未如期在此時上報國務院。當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被軍人坦克趕回校園之後，中共於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以「天安門動亂」幕後黑手之名，將《長江，長江》一書的主編戴晴女士，抓入了秦城監獄。

戴晴女士未參與八九學運，她其實沒有表態贊同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也就更不用說指揮或幕後操縱註。將戴晴投入中國級別最高的秦山監獄，其實是經過精心策劃，其目的不是對天安門運動的清算，而是為打擊三峽大壩工程反對派。註：參見戴晴《我的入獄》。

株連九族，是中國政治鬥爭中慣用的手段，而把反對三峽大壩工程與所

謂的「六四反革命動亂」聯繫在一起，無非是通過鎮壓六四民運，連同打壓三峽工程反對派。

戴晴被抓之後，彙集了三峽工程反對派意見的《長江，長江》，被列為禁書，從書店與圖書館撤下，並被焚燒銷毀。根據戴晴女士〈《長江，長江》成書經過〉一文記載：「我們印了五千冊，貴州社隨即加印五萬冊，沿長江發行。但他們只賣了兩萬本，『平暴』即發生。剩下三萬，作為『為動亂與**作輿論準備』，奉旨銷毀。」國務院「三峽經濟辦公室」向國家計委等單位寫黑信，狀告《長江，長江》書中文章的作者以及被採訪者，說其與天安門動亂幕後黑手戴晴，有不可告人的聯繫，要求這些單位的黨組織，在政治上審查三峽大壩工程反對派的成員註。

被告惡狀的人中，有原國家計委人口研究所副所長田方、和研究員林發棠。田方，一九三九年參加革命，曾任習仲勳副總理秘書、寶雞地委副書記、《陝西日報》社副總編輯，後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從事中國生產力佈局與人口遷移問題的研究，並與林發棠、張東亮編輯出版《生產力的合理佈局》、《中國人口遷移》等書籍。林發棠是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也從事生產力布局與人口遷移的研究。

「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

田方和林發棠在研究中國人口遷移問題時，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水庫大壩工程移民工作中所出現的問題，發現水庫大壩工程移民，成為中國貧困人口的主要組成部份。田方和林發棠從水庫大壩工程

移民的研究，切入到對三峽工程問題的研究。田方回憶說：「一旦鑽進去，便出不來了。……這個工程不光是修壩的工程技術問題，涉及政治、經濟、科技、社會、軍事、環境等等，不能光讓專業性的部門去論證。去年的洪災不能證明三峽工程必須上，只是說明過去水利工作方針有缺點。洪澇災害是因河道太淺，修多少壩也擋不住洪水。如果修三峽壩，只能擋二百億立方米水，發生一九五四年型的洪水，下游防不了洪，上游反會加重。」註：參見盧躍剛《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

aaa181715 2011-6-15 11:59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由田方、林發棠和凌純錫編輯的《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一書，收集李銳、孫越崎、千家駒、林華、陸欽侃、汪受衷、方宗岱等人關於三峽工程的文章。《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的出版發行，遭遇許多困難，正當第一本書行將問世之時，編者尚未見到樣書，主管部門的某領導卻首先拿到了。消息傳來，有關領導不滿意此書，不同意公開出版發行。後經田方等力爭，《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才能夠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與廣大讀者見面。

田方和林發棠繼續努力，編輯《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該書於一九八九年初出版。水利部部長錢正英等，於《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一書出版時，要求新華書店不能發售該書。到了六四之後，錢正英等又指責《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一書是「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動亂與**製造輿論」，並要求有關組織清查考察有關幹部。

在強大的政治打壓下，三峽工程反對派不能在公開場合發表反對三峽工

程的意見，不能在報刊、雜誌上發表反對三峽工程的文章。

黨內鬥爭工具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把長江三峽壩址作為上任後，第一個出訪視察目的地。當月二十五日回京，立即前往醫院看望李鵬，談及視察長江的印象，認為必須讓三峽工程上馬。至此，三峽工程，便成為共產黨內鬥爭、站隊劃線的分水嶺。(註 1：參見李鵬《三峽工程日記》。)

就在戴晴女士入獄後不久，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將工程可行性報告上報國務院審批。其中生態環境組報告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弊大於利，但一些弊病可以以人為的措施，加以限制。這個結論到了可行性總報告中，卻變成了：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利大於弊。一九九一年八月，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批准工程可行性報告，並以程式錯誤否定生態環境影響報告，並從九月起，著手重新撰寫第二個生態環境影響報告。此份生態環境影響報告，於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七日得到批准，結論為：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利大於弊。撰寫該報告的知識分子，為換取李鵬從總理基金中拿出的高額獎金，出賣了靈魂。(註 2：參見王維洛〈從三峽工程環境影響評價的變化看科學如何淪為政治的婢女〉)

aaa181715 2011-6-15 12:00

12 借屍還魂：主任上書，恢復舊制

「借屍還魂」，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十四計。

原文：「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借屍還魂」的意思是：凡是有用處的事物，都不能利用，而腐朽落後、沒有用處的事物，要加以利用，利用沒有用的事物，並不是我受別人支配，而是我支配別人。

把長江三峽工程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聯繫在一起，藉長江三峽工程，檢驗地方諸侯對中央領導是否忠誠，利用這些腐朽落後的觀念和手段，來促成三峽工程的上馬，是借屍還魂。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國務院原則批准了「一五〇方案」。

為配合三峽工程建設，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擬建三峽特區，行使省級職權，直屬中央管轄。後將三峽特區改為三峽省（籌），省會定在湖北省宜昌市。在中共中央三峽工程領導小組組長李鵬的推薦下，原來水利部副部長李伯甯出任三峽省籌備組組長。

李伯甯官升一級，「感到又高興，又惶恐。高興的是，我做了那麼漫長的三峽夢，終於盼到這一天，波光粼粼的高峽平湖已經在望了；惶恐的是，壓在我肩上的擔子太重，安置幾十萬移民的艱巨任務，我力不勝任。」

但中央既已決定，我只能服從且盡力而為！」三峽工程雖然還沒有開始建設，不過宜昌作為省會城市，省政府的辦公大樓已經開始建設，到宜昌來向李伯甯討官做的人是蜂擁而至。沒過多久，三峽省各個廳局，也都有了完整的領導班子。

但是好運不長，趙紫陽以全國**代表有意見，認為三峽省「不三（峽）不四（川）」，於一九八六年撤銷了三峽省（籌），改稱其為「國務院三峽地區經濟開發辦公室」，辦公室撤離宜昌，回到北京。雖然李伯甯仍為辦公室主任，但是李給朋友們封的大大小的官，全部作廢，哪裏來哪裏去，這讓李伯甯在人前是顏面盡失。

一九八六年，錢正英主持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李伯甯出任移民專業組負責人，提出「開發性移民」理論，並且認定三峽庫區人口環境容量大，擔保三峽工程移民可以全部在當地安置。李伯甯的「開發性移民」理論、以及三峽工程移民全部得以在當地安置的看法，被後來的事實證明是完全錯誤。

一九九八年長江洪水之後，朱鎔基發現三峽庫區根本無法安置全部三峽工程移民，特別是農村移民，提出異地安置，將近二十萬農村移民遷移到數千里之外的異鄉落戶。二〇〇七年，重慶市提出要移民四百萬，而且許多是已經在當地「安置完畢」的三峽工程移民。

aaa181715 2011-6-15 12:02

政治宣傳

六四事件之後，趙紫陽下臺，江澤民上臺。李伯甯為三峽工程上馬，多次給江澤民寫信。一九九一年夏，江澤民在李伯甯的來信上作了批示：三峽工程要進行正面宣傳，可以下毛毛雨。從此，三峽工程進入決策的最後階段。

那麼李伯甯究竟在信中提到了什麼，讓江澤民動了**？李伯甯在信中不但闡述三峽工程的綜合效益，而且還特別提到了建設三峽工程的偉大政治意義：

首先，長江三峽工程的建設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其次，建設長江三峽工程，可以激勵全民愛國主義熱情，鼓舞整個社會士氣；最後，長江三峽工程可以檢驗地方諸侯對中央領導是否忠誠。

官方公佈的三峽工程移民為一百一十三萬，為世界上移民人數最多的水庫大壩工程，這本是建設三峽工程的一個最大弊端，在西方任何一個**國家中，三峽工程根本不可能實現。西方國家的環保組織把三峽工程稱為「史達林主義」的產物，只有在獨裁國家中，才能得到實現。但是李伯甯認為，中國建設三峽工程，移民百萬，正是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只有中國才能集中全國的力量幹幾件大事。世界上有十幾國家的人口還沒有三峽工程移民人數多。哪個資本主義國家有這樣的魄力，能讓百萬居民搬遷？答案是：只有社會主義中國才有這樣的魄力。

六四事件之後，全國士氣低落。長江三峽工程，作為世界上發電裝機容

量最大的水庫大壩工程。因而被中共視為可以激勵全民愛國主義熱情的墊腳石。

檢驗地方忠誠

六四事件中，江澤民憑藉幾個老人的決定，從上海到北京，登上了中央領導核心。雖然在寶座上坐了兩年，但是地方諸侯對此是否服氣，江澤民心中確實沒有底。秦朝時，丞相趙高曾經指鹿為馬，測試官員是否順服。江澤民亦打算以長江三峽工程，檢驗地方諸侯對中央領導是否忠誠。

一九九一年全國經濟計畫會議結束之後，全國四十七位省長、自治區主任、直轄市市長及計畫單列市市長，組成全國省長長江三峽工程考察團，於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赴一場鴻門宴。

在三峽壩址三斗坪處，面對滔滔長江，這些地方諸侯們都表了態：「三峽工程是國家中華民族的象徵，它關係全國造福當代惠及子孫，建議國家盡早決策興建。不管受益不受益，修三峽工程是歷史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我們堅決支持！」

三峽工程是一個大型水庫大壩工程。省長們卻非要把三峽工程說成是國家中華民族的象徵，認為三峽工程會造福當代、惠及子孫，這是現代「指鹿為馬」。只是兩千年前還有指鹿說鹿的人，而今四十七位省長，都認鹿為馬了。

當然地方諸侯們對三峽工程的支持，不僅是口頭上，而是要從各省市的財政中，拿出錢來（最終都是納稅人的錢）。根據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的資料，到二〇〇六年，全國對口支援三峽庫區投資就高達二百七十七億元，這二百七十七億元，並不包括在一九九二年批准的五百七十億元三峽工程投資之內。

aaa181715 2011-6-15 12:04

13 聲東擊西：華東洪水，建壩鄂西

「聲東擊西」，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六計。

原文：「敵志亂萃，不虞，坤下兌上之象。利其不自主而取之。」

三江入 震澤定

一九九一年夏，中國東部地區的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發生洪水災害。中國媒體大量報導洪水損失，目的是「增強人們的洪水憂患」。其實這些報導都是在為三峽工程上馬營造聲勢。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報導中根本不分析造成一九九一年華東洪水災害的真實原因、以及三峽工程對減輕華東洪水的災難，有什麼樣實際的效果。

一九九一年夏，太湖流域發生洪水災害，經濟損失慘重。由於太湖流域是中國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為中國財政的錢袋子。然而，太湖流域歷史上並未有頻繁的、重大的洪水災害出現，而造成此次洪水災害的最主要原因則是：上海城市發展阻礙了太湖的洩洪通道，同時，

抗旱防汛總指揮部在錯誤資訊的基礎上，做出不正確的決策，加大了洪水災害。

太湖流域，是以太湖為中心、以黃浦江為主要洩水道之長江最下游的支流水系。太湖流域面積為三萬六千五百平方公里，北臨長江，南抵杭州灣，西至天目山、界嶺、矛嶺，東達東海。關於太湖的形成，有多種學說，多數人認為，太湖是長江和錢塘江泥沙淤塞古海灣所形成。太湖的總面積為二千四百二十八平方公里（包括湖中的五十一個島嶼，面積約九十平方公里）。

太湖流域的西北部為山區和丘陵，占流域面積的六分之一。入太湖的主要河流有南溪，笕溪，洮鬲水系。東部為平原和窪地，占流域面積的六分之五。平原區周邊高、中心低。周邊的高程一般為四至八米，中間窪地的高程一般為二點五至四米，窪地中心為太湖。

太湖古稱震澤。禹貢釋地中有：三江入，震澤定。意思是說，因為有三條入海通道，太湖則安定，少洪水災害。三江是指太湖的三條排水通道，指松江、東江和婁江。松江在東，就是吳淞江；東江在東南，婁江在東北。婁江的水道位置難以確定，人們認為瀏河就是古代的婁江。由於海塘的修建，太湖的東南入海口被堵塞。明朝開挖黃浦江，黃浦江先向東南，然後轉向北與吳淞江匯合，入長江口。

之後，黃浦江取代了吳淞江，成為太湖最重要的洩水道，洩水量在一般情況下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另外，人們還新闢了入海河道，如梁溪河、

望虞河、橫塘港、太浦河，錫澄河，大治河、海鹽塘等等。大運河在太湖東側，由南至北直穿本流域。簡單地說，太湖流域的排水絕大部份要通過上海，而浦東地勢較浦西低，是上海自然的排洪通道。

aaa181715 2011-6-15 12:12

北澇南旱？

國務院的中央防汛指揮部，為負責防洪防旱的權威領導機構，為了指導每年防洪防旱工作，中央防汛指揮部發表中、長期氣象預報，作為地方政府水利部門決定如何運用和調度其水利工程設施的依據。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國家防汛指揮部召開該年的第一次會議，會上國家防汛指揮部副主任，水利部部長楊振懷指出，根據氣象部門預測，今年盛夏，淮河流域，長江中下游和川東地區有伏旱（不是洪水）。聽說這年夏季有旱情，太湖流域水利部門立即做抗旱準備。於是決定盡可能利用現有水庫工程，太湖、澱山湖、甬湖、洮湖等湖泊及現有的河網多蓄水，以防可能出現的伏旱。

一九九一年春天，降雨不少，上游的水庫下閘蓄水，太湖亦下閘蓄水，準備留著給可能出現的伏旱用。到四月二十日，太湖水位已上升到三點五五米，超過警戒水位〇點〇五米。沒有人認為這樣做是危險的，因為國家防汛指揮部並未說今年將發洪水。

至六月十一日，太湖水位三點四六米，僅在警戒水位以下〇點〇四米。在汛期到來之前二個多月時間內，太湖水位控制在警戒水位三點五〇米

附近，種下了一九九一年洪水的禍根。

一九九一年，太湖流域的洪水是個雙峰洪水，可分為第一期洪水和第二期洪水，兩次洪水的分界線在六月份下旬。六月十一日起至十九日，太湖流域開始第一次降暴雨。開始時，人們繼續蓄水，當時仍認為，該年是旱，不可能雨水過多，以致未增加排放能力，六月十五日太湖水位達三點六八米，超過警戒水位〇點一六米。六月十八日江蘇省長陳煥友，致電上海市長**，要求上海市開閘，幫助太湖分洪。而江蘇省自己卻不願意打開望虞河等閘門，讓洪水流經江蘇省進入長江，理由是，如此將為江蘇帶來很大的損失。

江蘇省要上海開閘，因為流經上海的黃浦江，吳淞江和瀏河是太湖的自然排水通道，特別是黃浦江平日擔任太湖流域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排水流量。但黃浦江、吳淞江流經上海市中心。過去上海面臨這種情況，都是往浦東排水；浦西是市中心，而浦東是郊區，浦西的江堤大大高於浦東的江堤，要淹先淹浦東。而今，浦東是全國最重要的經濟開發區，新的金融中心，和浦西一樣，也淹不得。其次，上海的城市發展，採用的是兩翼發展（沿長江和沿杭州灣，左翼有寶山鋼鐵公司，右翼有金山衛石化公司），兩翼也淹不得。在上海市的城市規劃中，只體現了**發展浦東新區的意圖，而忘記了浦東原是自然排洪通道的功能。

歷史上是三江入，震澤定。當一九九一年洪水到來之時，三條通路全被堵塞，太湖流域則不得安寧。由於上海市和江蘇省都不願承擔洩洪任務，

中央防汛指揮部要求浙江省開啟太浦閘洩洪。此舉意味犧牲浙江部份地區，以減低太湖水位。從地形上看，選定浙江作為出口，是最下策，因為浙江大部份地區地勢略高，只有嘉興一帶地勢低窪一些，但面積不大。況且太浦河工程尚未完工，洪水無法入海。然而在政治和經濟實力上，浙江省的地位在三家中屬最弱。

六月二十六日十二時，浙江省開啟太浦閘，放水一百立方米 / 秒。太浦閘開閘後，太湖水位曾一度下降，達四點〇九米，太湖水位下降，中央防汛指揮部認為所採取的措施與抗洪取得了成果，於是，六月二十七日再次著重指出：經國家氣象局、國家防總、中國科學院大氣所等單位協商結果，今年總的可能是，北澇南旱。

隨著天氣形勢的發展，長江以南和西南老旱區仍有可能受旱。因此，太湖流域也沒有利用六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的時間，加大排放量，減低水庫水位和太湖流域河網的水位。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國家防汛指揮部第二次會議的錯誤資訊，使太湖流域防洪減災，又失去了一次機會。

水來炸壩

出乎國家防汛指揮部的預料，從七月一日起，太湖流域再次普降暴雨，這次暴雨的強度和範圍遠超過第一次。山區的水庫已然沒有存儲能力，只有大量向下游洩洪，來自上游水庫的洩洪量，又經過人工管道進入太湖，太湖的水位上升，太湖流域河網的水位亦全面上升。蘇州被淹，無錫被淹，常州被淹，嘉興被淹，湖州被淹。

七月四日下午二時，太湖水位已達四點四四米，水位在太湖大堤的約束下仍繼續升高，水位大大超過地平線。太湖每升高一釐米，潰堤的危險就增加十分。萬一太湖堤潰，太湖中的洪水很可能沿自然出路，沖向上海市，沖向浦東開發區，沖向寶山鋼鐵公司，沖向金山衛石油化工總公司，同時也會沖潰滬甯和滬杭鐵路幹線。

在此危急情況之下，國家防汛指揮部一面下令加「大」太浦河的洩洪量（此時已經沒有洩洪能力），另一方面要求江蘇省立即打開望虞河，排放太湖中的洪水。此時，江蘇省只想利用望虞河排放蘇州、無錫和常州等地的洪水，減輕（江蘇省）這些地區的損失，因為蘇州、無錫和常州是江蘇省經濟重點，三市的工業產值可以和上海市相比。江蘇省不能理解的是，為何保上海而犧牲蘇州、無錫和常州的利益？

江蘇省拒絕開啟太湖至望虞河的閘門為太湖洩洪。七月四日，國家防汛指揮部決定炸開紅旗塘壩和錢盛塘八道堤壩。七月五日九時，在上海市委領導人的親自監督下，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用四噸炸藥炸開紅旗塘壩。

但此舉無效，太湖水位不但沒有下降，反而繼續上升。七月七日十六時，太湖水位達到了四點六八米，超過歷史水位（四點六五米）〇點〇三米。七月八日十九時，上海市委領導人又親自趕到錢盛塘，督促解放軍部隊炸毀錢盛塘。七月八日十時，國家防汛指揮部強令江蘇省無條件撤除沙

墩港壩，打開望虞河，為太湖排洩洪水。(註)：國家防汛指揮部，對江蘇省領導的地方主義和不服從命令的做法十分不滿。

七月十一日十二時，江蘇省副省長只得親自坐陣，拆開沙墩港壩，讓太湖北部的洪水進入望虞河。江蘇省打開太湖通往望虞河的閘口，比國家防汛指揮部的要求，晚了整整七天。然而即使沙墩港壩被炸開，太湖的水位不但沒有下降，反而(註)：此處時間上的順序，由於按照地點寫作，因此第二時間比第一時間早。

先是寫太湖在上海出口的情況，再寫太湖在江蘇出口的情況。

上升，至七月十五日晚八時，太湖水位達四點七九米，超過最高水位〇點一四米。為何打開望虞河沒有效果？因當打開望虞河時，望虞河的洪水水位達四點九五米，比太湖的水位還高，炸開沙墩港壩，只會使太湖水位上升，而不會使太湖水位下降。

國家防汛指揮部在此情況下，強命江蘇省炸開沙墩港壩、打開望虞河的決定，是感情用事，其目的就是要求江蘇省無條件服從命令。

縱觀一九九一年太湖流域洪水，並沒有發生國家防汛指揮部年初所預報的旱災，反而是遭受了一場百年一遇的洪水災難，為一場以天災形式表現出來的人禍。分析一九九一年太湖流域的降

雨量，只是二十五年一遇，對比一九五四年五月至九月的洪水，當時太湖流域總降水量達九百毫米，太湖水位達四點六五米，淹了五百萬畝土

地。而一九九一年五月至七月，總降水量只有五百毫米，太湖水位卻達四點七九米，並在蘇浙滬相續有計劃地炸壩，開闢排水線路，但太湖流域的水位仍長期居高不下，造成嚴重生命財產和經濟損失。一九九一年太湖流域洪水由於人為錯誤，使得二十五年一遇的降雨量，造成了一場百年一遇的洪水災難，損失慘重。

aaa181715 2011-6-15 12:15

華東洪水 建壩鄂西

全國**委員長萬里，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七屆全國**常務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上，專門談及此次華東洪水的成績和經驗教訓。萬里認為華東洪水最大的啟示，就是必須大大增強全民族的水患意識。同時指出，中國的許多大江大河尚未根本治理，已經建設的一些水利措施，也存在防洪標準偏低和缺乏系統配套的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增長，洪水造成的損失必然越來越大。沿海的幾個三角洲地區，經濟最發達，人口最密集，又都處在大江大河的下游，一直存在著水害的潛在威脅。大江大河一旦出事，勢必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打亂和推遲四化建設的進程，影響第二步戰略目標的實現。在為當代人利益著想時，也要考慮到後代人的利益。如果不指出這種潛在的巨大危險，並採取有效的措施，那就是沒有盡到應盡的歷史責任。

萬里提出，因華東洪水所在範圍，同屬長江流域，根治長江，必須把長江一百八十萬平方公里作整體考慮。他認為，如果三峽工程上馬，就會確保長江中下游兩岸人民的生命財產。從整個國民經濟穩定發展這個長

遠的需要看，以及從確保長江中下游的安全這個緊迫需要看，三峽工程關係到億萬人民切身利益的長治久安，遲上馬不如早上馬，建議國務院列入十年規劃。此時，全國**早已給出信號，意圖趁熱打鐵，要求國務院提交興建三峽工程議案。

然而問題是，華東洪水在東，雖說在地域上屬於長江流域，但和幹流的洪水，沒有任何關係。一九九一年太湖、淮河的洪水，為當地降雨所造成；而形成嚴重的洪水災害，則是由於錯誤決策所致。三峽大壩在西，位於太湖以西幾千公里。三峽工程的建設，最多對減輕長江中下游荊江地區的洪水壓力，有所幫助，根本不可能確保長江中下游兩岸人民的生命財產，對經濟最發達，人口最密集的長江三角洲，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

正是對華東洪水災害原因的錯誤分析，才得出錯誤的決定。洪水在長江三角洲東面，卻得出在西面幾千公里之外建高壩，以確保長江中下游安全的結論，無異是「聲東擊西」。

aaa181715 2011-6-15 12:17

14 圍魏救趙：避開鋒芒，攻其弱處

「圍魏救趙」，為兵法三十六計之第二計。

原文：「共敵不如分敵，敵陽不如敵陰。」

敵陽不如敵陰

圍魏救趙的故事發生在戰國時期。西元前三五四年，魏國進攻趙國，包圍了趙國的首都邯鄲。趙國向齊國請求救援，齊王命令田忌、孫臏率部前去救趙國。孫臏認為，魏國大將龐涓率主力正在攻打趙國，魏國國內空虛，不如率部去圍打魏國，迫使魏軍放棄進攻趙國而回師來救，這樣既可以解趙國之危，又可以在途中設伏，重創魏軍。於是齊國軍隊向魏國進攻，包圍了魏國首都大梁（今開封），龐涓聞訊後，率部兼程趕回魏國，在途中陷入孫臏的埋伏，魏軍大敗，龐涓喪命。

圍魏救趙的智慧，正是兵法所言，與其進攻兵力結集之處，不如打擊敵人兵力分散的部位；攻擊敵軍陽剛之處，不如攻擊敵人陰弱的部份。

三峽工程主上派採用圍魏救趙的計謀，避開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批評，而將攻擊目標指向三峽工程緩建派。利用有意壓低三峽工程所需要的投資，造成三峽工程虛假的各項優秀經濟指標，從而得出國家財政可以承受三峽工程建設的結論。而由於政治因素，緩建派只是向中央領導建議暫緩興建三峽工程，無法直接在生態環境和移民安置等重要問題上，向三峽工程主上派進行挑戰，以致被對手所利用。

三峽工程「緩建派」

一九八二年**為三峽工程開了綠燈，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原

則批准興建三峽工程方案，引起國內外強烈反對，特別是來自全國政協委員的反對。但由於政協委員的政治身分和以往教訓，致使三峽工程反對派不敢正面反對中共中央，而是以「緩建派」的面目出現，抱著「武死戰，文死諫」的忠誠之心，向決策者上書，提醒政府，三峽工程投資過大，國力不足，工程經濟效益不好，不宜過急做出決策。因此三峽工程的反對派，在很大程度上是緩建派。真正公開提出堅決反對三峽工程建設的，只有黃萬里、侯學煜等少數幾人。

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為三峽工程反對派領軍人。周培源是個物理學家，早年留學美國和德國，曾師從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其後事業也頗有建樹。在其後半生中，以科學家的身分活躍於中國政治舞臺，是位不倒翁。周培源先生擔任過北京大學校長，中國科協主席，九三學會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等高職。

長江三峽工程論證是周培源生命歷程最後十年中，最關心的事情之一。一九八四年以來，周培源先生一直反對長江三峽工程快速上馬。他曾率一百八十二位全國政協委員，視察三峽工程所涵蓋的湖北省和四川省，回北京後又上書中央，建議緩上長江三峽工程。此時，周培源先生並未如同以往，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統一思想，統一行動。他從解剖自己開始：為什麼在五十年代是個長江三峽工程的積極的支持者，到八十年代卻站到另外一面去了？他認為當時是從狹隘的愛國主義出發。

「我在五十年代曾是三峽工程上馬的積極分子，那時主要是看了我們

自己選的三斗坪花崗岩壩址，比過去薩凡奇所選的南津關石灰岩壩址要好的多，其他方面未作研究。近幾年來，因多看了些材料，多作了些瞭解，特別是政協經濟建設組作了詳細而切實的調查，使我認識上有了很大轉變。我覺得這個問題關係國家千年大計，必須慎之又慎。」

aaa181715 2011-6-15 12:19

一九八七年五月，周培源為田方等人編著的《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撰寫了序言：「回顧這一段歷史，三峽工程所以長期上不了，看來主要問題在於僅就三峽論三峽，而沒有從長江流域幹支流總體規劃，並結合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和國家實力的可能性，從經濟發展戰略上來考慮問題……我們堅決擁護黨中央和國務院對三峽工程要重新進行論證的英明決定。但論證的主題不應是就三峽論三峽、單獨論證三峽工程蓄水位元一百五十米或壩高一百八十五米的問題；而應是論證先開發支流或其他優選方案，還是先建三峽工程，以及這一超大型工程是否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發展戰略等宏觀決策問題……過去的教訓，是千萬不要急於求成，主管部門尤其不能主觀地追求興建一座超世界水準。(註)：周培源是當年三峽工程研究的負責人。

巨型工程而聞名於世。否則欲速不達，適得其反。再說一句：如果不經過各個方面的反覆論證，沒有充份的科學依據，就倉促上馬，勢必後患無窮，後悔不及！」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日，周培源上書中共領導人：「且不談三峽工程技術上的問題是否已經全部解決，即使決定立刻上馬，由於它投資大，工期長，見效慢，十幾年內只投入不產出，對於翻兩番的目標，也不能起推動作用。甚至可以說，由於它占用大量資金，擠掉了其他本來可以上馬的項目，反倒會拖翻兩番的後腿……我覺得，決定三峽工程是快上還是緩上，除了一些具體的技術上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外，主要因素是我國的財政承受能力問題。在我國目前的財力物力條件下，特別在物價，工資改革的關鍵階段，上馬三峽工程這一特大建設專案是不適宜的，如果硬要上馬，勢必通貨膨脹，加劇經濟動盪，影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戰略決策的實現，還會對人民群眾形成心理上的衝擊，以致於影響深化改革所必需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基於以上的考慮，我認為三峽工程快上不如緩上。等將來翻兩番的任務實現，國家經濟實力增強，科技水準提高了，那時再來考慮三峽工程的修建問題。」周培源把財政承受能力作為三峽工程緩上的主要因素，成為日後三峽工程緩建派受到主上派攻擊的致命薄弱點。

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戴晴作為六四的「幕後黑手」被抓入監獄，戴晴主編的《長江，長江》被禁，三峽工程反對派因此受到牽連，無法發出聲音。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三日，江澤民、李鵬接見參見三峽工程論證彙報會的代表，周培源也出席了這項活動。周培源直接向江澤民、李鵬提出三峽工程有些問題還是沒有研究透，比如：人防是否安全，建議中共中央推遲三峽工程的決策。

這是周培源最後一次的努力。三峽工程緩建派認為，只要時間拖得越長，三峽工程上馬的希望就越渺茫。孫越崎老先生向中共中央遞交了《關於三峽工程問題的調查報告》，「報告」的結論是：三峽工程近期不能上。李銳也幾度上書中央領導，建議三峽工程「在重大問題尚未圓滿解決以前，考慮暫緩興建。」

三峽工程「反對派」

真正提出堅決反對三峽工程建設的只有黃萬里、侯學煜等少數幾人，他們認為，從自然地理學和生態環境學上來分析，三峽工程不是早上或晚上的問題，壩高多少米的問題，而是絕對不能上的問題。三峽工程的最大問題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是幾百萬移民的安置問題；其次才是工程的技術問題和工程的經濟問題，以及工程資金來源問題。由於堅決反對三峽工程建設的人數比較少，再加上黃萬里先生被排除在三峽工程論證之外，他的文章在國內有影響的報刊雜誌上也不給予發表，以致於人們對三峽工程堅決反對派的瞭解比緩建派要少許多。

三峽工程主上派不敢正面接受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挑戰，他們避開反對派的鋒芒，選取三峽工程緩建派作為攻擊重點，進行反擊。因為緩上三峽工程的理由，只能是工程造價太高、資金籌集困難、技術問題尚未解決、河流流域的開發次序問題等等，而對生態環境問題、移民問題，則不可能提出充份的論據。因為無論早建還是緩建三峽大壩，工程將造成的生態環境問題和移民社會問題，本質上不會有很大的區別，只是時間遲早

的問題。

在工程可行性論證中，根本不進行可行性論證最主要的內容，即：上和不上三峽工程的方案比較，而只是進行蓄水位高低（海拔一百五十米、海拔一百六十米、海拔一百七十米、海拔一百八十米）和建設方案（一級開發分期蓄水和兩級開發）的比較。因為緩建派沒有表示反對建設三峽工程，所以建還是不建，就不用論證了。在經濟比較中，雖然考慮了早建、晚建和不建三峽工程三個方案，但卻沒有考慮三個方案對於生態環境破壞的差別，這是由於早建和晚建兩個方案，在生態環境破壞方面，沒有本質的差別。這就使得本來應該在經濟比較中為最優的「不建三峽工程方案」，成了最差的方案。

三峽工程之總投資

另外，三峽工程主上派在工程投資、資金籌集、經濟合理性和國力承受能力分析上，確實下了一番工夫，著力打擊緩建派。

三峽工程主上派的主要做法是：在三峽工程審查之前，儘量壓低工程所需要的投資；而在三峽工程審查之後，再將真正所需要的資金公佈出來。由於人為壓低了三峽工程投資，從而資金籌集的困難、經濟的不合理性，在可行性論證中都無法體現出來。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做「關於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的說明」時說，三峽工程按一九九〇年價格估算的靜態總投資為五百七十億元人民幣，其中樞紐工程投資二百九十八億元，水庫移民投資一百八十五億元，輸變電

工程投資九十七億元。第一批機組發電之前所需要的投資為三百億元。

UnRegistered